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8年8月31日第23期 总第233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233期

目录

【专稿】

姜成洋 记忆幻觉的心理真实

——一位村干部的文革经历与事后记忆

【评论】

安希孟 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对敌斗争的哲学大纲

王晓林 顾准对《自然辩证法》的追求

【重评经典】

韦陀 钱广与雷锋——小议文革中的重拍片《青松岭》

【述往】

王理 文革中在顺义的“八年抗战”（上）

小鹰 文革中我参加过的“相对论批判”

【怀人】

潘泰泉 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沈达力的离去

【资料】

我们是怎么教《学习雷锋》这节课的（北师大女附中初三组）

北师大女附中学校工作 1964年—1966年规划（草案）

卞仲耘 1955年笔记摘录

【读者来信】

1. 任国庆：近期《记忆》小鹰的文章甚佳

2. 张建伟：扩大研究领域，重视保守派、逍遥派研究

【本刊声明】

【专稿】

记忆幻觉的心理真实

——一位村干部的文革经历与事后记忆*

姜成洋

摘要：这篇文章有如下三个写作目的：一、二十世纪后半期，亦工亦农做为招工改革和缩小城乡差距的探索，在具体落实中呈现了怎样的复杂面相；二、二十世纪后半期，共产主义信仰与现实环境的碰撞，如何决定了微观个体的波折命运；三、年长者在回忆过往时，往往形成记忆扭曲或记忆幻觉，这种幻觉可能包含个体对后来经受挫折的心理补偿。个体可能意识到记忆幻觉的存在，也很可能意识不到。

关键词：文革，乡村，亦工亦农，记忆幻觉。

很长一段时间，我曾酝酿以“大历史下的小人物”为主题，写几个微观人物的人生经历。这种想法源于乡村访谈的感受，我发现，每个社群都有有故事的人，都有会讲故事的人。当然，两者是有区别的。有故事指个人经历丰富，且不无曲折。会讲故事，则重在强调个体的口头表达，甚或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因为这些故事不光涉及自身，还充分发挥了想象力，有时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有故事的人往往也会讲故事，尤其在年长之后，很自然地会形成不错的故事叙述能力。¹对于微观历史研究者而言，这无疑是最理想的研究对象。

这篇文章的主角，是一位名叫王殿明的老人。他1931年出生在山东半岛一个普通村庄。中共执政后，他长期担任村庄领导职务。按照村民的记忆与评价，如果王殿明出生于晚清，他大概符合传统中国对理想乡绅的要求标准——德才兼备。王殿明本人也不无自豪，在数次访谈过程中，他经常自问自答地对我说：“要说我这个人，不过小学二年级水平，

* 作者简介：姜成洋，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史博士，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方向为大众记忆、当代乡村社会史。

¹ [美]丹尼尔·夏克特：《寻找逝去的自我：大脑、心灵和往事的记忆》，高申春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27页。

凭什么能让上上下下心服口服？”“实践！”没等我反应，他自己就脱口而出。的确，除了“村干部”的标签，王殿明可以配得上“能工巧匠”的称号。他能做木匠，能做瓦匠，也敢于领导全村的生产和。实践出真知，这句近乎真理的老话，在王殿明的人生经历中得到了充分印证。

我很早就萌生了为他写篇小传的想法，因为村里人不断向我暗示：王殿明是位很有故事的人。几年前，当他得知我的访谈意图，仿佛遇到知音。“我的经历能写一本好小说！”他拍着大腿，很是激动。自然，求实的标准让我与文学叙述保持了距离。同时，如果访谈经历足够丰富，王殿明的豪爽本应第一时间引发我的警惕。也就是说，他在知道我的写作意图后，很可能会有意无意在个人经历中掺杂虚构。进一步说，如果访谈经历足够丰富，我本应在整个过程中隐蔽自己的访谈意图。无论如何，当后期写作中意识到这个问题时，我发现自己不自觉地扮演了发掘记忆与参与记忆重构的双重角色。

我谨慎地避免观念先行。正如美国历史学者塔奇曼提醒的：“在一开始，找出发生了什么就够了，不必急于确定‘为什么’。在搜集了足够的事实，并将它们依时间顺序排列之后，再问‘为什么’，才更安全。”¹在积累了足够素材后，我本打算以“性格决定命运”的主题，贯穿王的人生经历。但没过多久，这种微观传记的写作逐渐不再让我满意。我提醒自己，用一种描述性的语言，来超越就事论事的历史叙述。这次追求超越的尝试，源于我对微观人物的心理探索。而这一更深层次的发觉，实际源于写作过程中的一次自我反省。

先从王的故事说起吧。

一、扑朔迷离的年轻人

1931年，王殿明出生在山东半岛一个普通村落——高格庄。集体化时期，村庄隶属于莱阳县赤山公社。村庄历史并无太多波澜。1947年老区土改，甫一掌权的干部大肆奸杀淫虐，大概是村庄记忆中最耸人听闻的历史。即便进入新世纪，经历或未经历那段历史的长者，都将“1947”视作血色恐怖的代名词。²1947年过后，新政权初期的胶东乡村运动频仍，但在1947的强烈对比下，这些运动不足以使农民形成惊心动魄的记忆。若问新政权

¹ [美] 巴巴拉·W·塔奇曼：《历史的技艺：塔奇曼论历史》，张孝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12页。

² 关于胶东半岛1947年的土改，作家张炜在长篇小说《古船》中有详尽的描述。

下的乡村什么时候混乱，村民大概都会提起 1966 年的冬季。

1966 年夏天，文化大革命波澜初起。到了冬季，汹涌狂潮波及高格庄。据王殿明回忆，冬季一个普通日子，长年在哈尔滨当兵的一位姓姜的年轻人突然返回村庄(下文以姜代指)。姜的家族早些时间搬出了村庄，他的突然回归，似乎预示了即将到来的革命风雷。¹

果然，姜一进村，便匆忙走街窜巷，鼓动村民革命造反。运动频仍的毛泽东时代，大凡运动兴起，总有一些好事者奔走呼号。有生活阅历的长者几十年后回忆往事，会这样向你描述当年的积极分子：“复杂啊，也有想着夺权的，也有很多心眼不够，跟着瞎吆喝的”，“瞎吆喝的占多数”。实际上，很大一批村民在经历多次运动后，即便一开始热情高涨，随后也多是消沉。当他们看着乱哄哄、走马灯般涌现的造反组织时，有些人会私下嘀咕：“瞧他们彪呼呼的样儿。”²也有人事后总结：“就是大孩熊小孩。”³

姜想要鼓动村民，但似乎成效不大。好在村子里也有人想要夺权，姜作山就是一位代表人物。姜作山在新政权建立前期的内战中不幸负伤，他为革命付出的代价是一条胳膊。新政权建立后，他曾被安排在赤山公社供销社工作，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返回了高格庄村，不担任领导职务。也许仗着自己负伤有功，姜作山感觉自己有资格掌握村中权力。于是，外来的年轻人姜与村内姜作山结成了造反夺权的统一战线。他们鼓捣了一冬天，造反夺权的势头似乎酝酿成型。

这年冬天，高格庄进行了两次批斗大会，也是文革期间仅有的两次批斗。第一次发生在 1966 年底，斗的不是村内干部，而是赤山公社的一名李干部。大凡批斗，总是关乎了某种利益。这次揪斗李干部，为的是出一口恶气：李的老家在莱阳县北部的栖霞县，离赤山公社较远。为了便利与妻儿团聚，他依托公社人事关系，将妻儿寄住在高格庄村，并编入该村一个生产队参加集体劳动。这位干部妻子好占小便宜，为了方便儿子偷吃多占，在儿子衣服内侧缝了几个大口袋。大概也是仗着干部家属的身份，儿子收工回家时，常常将上衣装得鼓鼓囊囊，惹得村民很是气愤。于是，文革造反狂潮一起，红卫兵就干出了“替村行道”的事情。批斗李干部的时候，可能年轻人姜还没有返回村庄，抑或来到村庄没有参与其中。总之，村庄第一次批斗，主持的红卫兵里并没有这位外来的年轻人。同时，这次批斗的目的纯粹为了出气，与村庄夺权没有关系。可随之而来的第二次批斗，则关乎村

¹ 口述者王殿明（1931 年—2018 年），2017 年 1 月 27 日，山东省莱阳市万第镇高格庄。

² 口述者姜作晓（1940 年—），2016 年 10 月，莱阳市万第镇高格庄村。

³ 口述者姜成善（1933 年—），2017 年 8 月 8 日，莱阳市万第镇高格庄村。

庄权力结构变更。

就在文革兴起的一年前，高格庄村权力结构发生了些许变化：先前担任组织委员的王殿明改任大队副书记。大队副书记相当于村庄第三把手，仅次于掌管党务的大队书记姜成芳和负责生产的大队长王殿登（王殿明的二哥）。乍看起来，这似乎是不起眼的职位变动，但村里人明白，书记和大队长的城府远不及王殿明深厚，似乎他俩成了出头露面的先锋，而王殿明才是掌管村务、出谋划策的实际幕后人。¹

要说王殿明这极深的城府，并非外人想象的那般阴险。实际上，这个人有心机，却也非常耿直，甚至耿直到只认理不认人的程度。这种耿直劲儿，似乎又与前面提及的极深城府相冲突。²就仗着这股耿直劲儿，他在管理村庄事务中，难免令一些人心里不快。再说，大队书记姜成芳不善言谈，实际上，王家两兄弟把持了村中主要权力，这大概也会惹一些人说是道非。不过，因为王殿明在村中辈分极高，且颇有管理生产的能力，由此形成的威望使心里不满者敢怒不敢言。

文革热潮一兴起，有些人压抑已久的造反意识便乘势喷涌了。

1967年农历正月初一晚上，王殿明出门。当他来到大队办公室的礼堂时，感觉形势不对头。他绕着礼堂转了一周，便立马来到了自己二哥王殿登家里。二哥见其夜访，便问：“还没睡啊？”“没有！问题就在明天！”王殿明说道。“哪木了？”二哥一头雾水。王殿明以不寻常的政治敏感性告诉二哥：“形势不对，明天一定得有批斗会！”³

王殿明敏感的预判在第二天得到印证。正月初二一大早，造反派召集全体村民来到礼堂参加批斗会。礼堂容量有限，外面空地上也挤满了观望的村民。部分红卫兵手里举着大字报，上书“王殿明走资派！”、“王殿明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为自己！”这次批斗关乎村庄权力变动，远比第一次扣人心弦。

不一会，一位红卫兵头头上台主持大会，“今天的大会，只要我不同意，任何人不许发言……”简短开场白过后，台下那位年轻人姜立马煽动起现场氛围：“王殿登、王殿明，到上台来接受批斗！”

王殿明毫无惧色，朝二哥大喝一声：“上！”便大踏步上台。二王上台，姜便开始鼓动批斗。然而，形势的发展出乎年轻人和村内造反派的意料。还没形成造反阵势，王殿明

¹ 口述者姜成善（1933年—），2017年1月28日，莱阳市万第镇高格庄。

² 口述者姜作晓（1940年—），2017年1月26日，莱阳市万第镇高格庄。

³ 口述者王殿明（1931年—2018年），2017年1月27日，莱阳市万第镇高格庄。

一把扯下上衣扔到台下，不惧严冬寒气，光着膀子怒斥造反派胡闹。他的斥责使自己很快掌握了会场主动，于是进一步向村民回顾这些年的生产建设成绩。王的气势完全镇住了会场，一开始呜呜洋洋的造反派们，一个个哑口无声。正当姜手足无措之际，王殿明指着他，喝令台下群众：“把他给我弄出去！”姜不及反抗，竟被礼堂内的几位村民架着扔了出去。

造反派完全镇不住王殿明的气势。这一切没有超出王的预料，他似乎根本没把这批造反派放在眼里。实际上，其他村民也承认：就是换成姜作山或者其他，他们也领导不好这个村子。看来，这出闹剧的结果，八成在村民意料之中。¹

当天晚上，村支部召开会议，为这次夺权活动定性。村支部原班人马不变，同时将这出闹剧定性为“反革命活动”。第二天一早，回村革命的年轻人姜便灰溜溜逃走了。

必须承认，1967年的“革命闹剧”，已经变成了深刻的村庄记忆。同样必须承认，这出“革命闹剧”的再呈现，并不完全合乎史实，甚至很多细节远远背离史实。上面的故事陈述，结合了诸多村民记忆，当然，主要细节以王殿明的记忆为主。问题恰恰在于，王殿明的记忆与很多年长者的记忆颇有差池。最大的差别在于，王回忆中的那位年轻人姜，并不存在于其他年长者的记忆中。为什么出现了这种差别呢？

当我发现这种吊诡的记忆差别后，一时感到了无助和失望，我不知自己该如何构建故事。一段时间内，思维的懒惰占据上风，我决定按照王殿明的回忆进行写作。我给自己的理由是：略去那位年轻人的角色，这个故事会失去很多生动的色彩。

这种思维的懒惰，实际掺杂了大量伪装。因为我确信，当文字呈现于读者面前时，没有人会发现此间曾有的思维蹊跷。然而，这种懒惰仅仅持续了两个月时间。一种暗含自我褒奖的写作良知提醒我——是时候戳穿谎言了，即便你仍然无法确知当时的历史情境究竟如何。而这次自我戳穿立马带来了写作路径的开拓，它使我由最初对村庄历史、个人命运的叙述，转变为探究人的记忆何以产生歪曲与幻觉。

就这个问题，我访谈了其他村民。他们的反应大概分成两种：有的人说自己不记得有那个年轻人，但确实记得王殿明光着膀子站在台子上；另一些人则很明确地告诉我，王殿明说的不是事实。随着访谈人数的增多，几乎可以肯定，王的记忆出现了错误。村民记忆是正确的，村庄历史中从未出现过远方归来的年轻人。针对这个问题，我曾向王殿明表达过质疑：“很多人回忆中并没有这样一位年轻人，是不是您记忆错了。”王不屑地反驳：

¹ 口述者王殿明（1931年—2018年），2017年1月27日，莱阳市万第镇高格庄。

“他们都不上心。”王殿明是一位正直务实的长者，别人记忆里未曾出现的年轻人，唯独在他的叙述中出现，这个疑惑立马抓住了我的探究欲望。那么，王殿明记忆幻觉的根源在哪里呢？

在我探究王殿明经历的这段时间，无论他自己还是其他村民，大家向我讲述最多的，是王殿明在赤山公社亦工亦农的经历。这段经历始于1971年，止于1986年，前后总共十五年。故事的重中之重，是他后期有一段冤屈。我最初的写作，也是倾向于重构他亦工亦农的故事，而文革初期的勇斗红卫兵的经历，只能算无意间捕捉到的一个细节。我渐渐有个猜测，王殿明后期亦工亦农的曲折故事，会不会对文革初期的记忆幻觉提供某种解释？

我们继续返回历史情境中。

二、亦工亦农的波折经历

1970年某一天，赤山公社的几位干部来到王殿明家中，这是他们第三次前来拜访了。三顾茅庐，只为请王殿明出山，主持赤山公社的硫酸厂生产（莱阳县第二化工厂）。他们为什么要找一位老农主持工厂生产呢？我们开篇提过，王殿明享有“能工巧匠”的名声，这种名声早就扬名整个公社。当然，除个人因素外，这次招工也得益于当时中国的亦工亦农制度。

亦工亦农这个名词，最早出现在1965年。刘少奇号召实行半工半读，亦工亦农，这是对教育制度和招工制度的双重改革。¹实际上，亦工亦农是1950年代临时工的延续。它的原则大体是：用工地点在城镇的工厂，首先从适合条件的城镇劳动力中招用，解决不了时，再从本地区农村招用；用工地点在农村的工厂，经市、县劳动部门同意，从附近人民公社生产队招用工人。招用时，原则上照顾地少人多的生产队及贫下中农群体。²

应该说，这种劳动制度可以解决当时城镇劳动力欠缺的问题，它的初衷也含有缩小工农差距的美好愿望。³然而，在具体落实中，理念与现实存在不小差距。这种差距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为亦工亦农预留的生产岗位，多是带有危险性或体力消耗大的工作，这些岗位不受城市户籍者欢迎。可以看出，自1958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确立后，城乡人群在

¹ 《刘少奇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65—469页。

² 《关于对临时工使用和管理问题的改进意见（草稿）》，1965年2月20日，莱档22—2—11—3。

³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10月，第114页。

谋生选择上已经形成了隐形的等级差异；¹另一方面，尽管工作岗位不受城市人欢迎，对于常年田间劳作、勉强糊口的农民来说，这却是机会难得的香饽饽。由于资源稀缺，实际外调安排中，各个大队的招工指标往往被分给了干部亲信。如此一来，高层的社会分工新篇章，变成了基层的近水楼台旧人情。

亦工亦农的种类比较复杂，包括季节工、轮换工、包工等不同名目。文革期间，高格庄及周边村庄外调的亦工亦农者均为轮换工。所谓轮换工，指从事矿山开采、地质勘探以及化工类工作的职工需要定期人员轮换，以便保证人身安全。轮换工期限一般为五年，最长为七年。期满后回乡生产，不再延长。按照政策，在安排亦工亦农劳动力时，对贫队、受灾队和地少人多的队，应加以照顾，尽先调用。轮换制工人，应从劳动力多的户中选调，一户仅有一个劳动力的，一般不安排。当然，招工也看重农民的家庭成分，尽先吸收家庭成分是贫下中农的社员。²

实际上，很多村庄在执行招工政策时，不但没有照顾家庭成分，多是招用了与村干部关系更近的家庭，而且，并没有按照政策实行轮换。准确地说，他们也在轮换，只不过变成了内部不同岗位的不定期调换。也就是说，只要最开始没有被选为轮换工，那基本就再也没有机会了。³

1969年“九大”召开不久，中国经济出现了持续两年之久的“冒进”，带来的影响是基建规模盲目扩大，重工业生产急剧膨胀。莱阳县第二化工厂的创建，正是源于这种社会背景。当时，根据勘察队勘测，赤山公社北部一带含有磷矿，这是生产硫酸的原材料。实际上，这一带的确有些磷矿，但并非富矿。复杂的矿物成分加上当时并不先进的化工技术，一开始就为十年后的生产困难埋下了伏笔。

在化工厂正式建设生产之前，赤山公社亟需解决的问题是招工，当然，更紧迫的问题，是寻找主持生产的负责人员。于是便出现前面提到的“三顾茅庐”情景。

对于主持工厂生产，王殿明态度非常谨慎。这大概出于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化工生产不比农村建设，王殿明实在没有生产的知识储备；另一方面，这是莱阳县直接负责的工厂，一旦上马，责任艰巨。所以，王殿明的再三推辞丝毫没有半推半就、讨价还价意味。数次拒绝惹急了前来拜访的公社干部，一位干部情急之下，脱口说道：“你干也得干，不

¹ 关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形成历史，参照王海光：《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出台的制度背景分析》，载《时过境未迁——中国当代史采薇》，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22页。

² 《关于实行亦工亦农劳动制度的试行办法（草案）》，1965年4月12日，莱档22—2—11—5。

³ 《烟台地革委批转地区劳动局〈关于临时工制度改革的情况报告〉》，1971年8月8日，莱档22—2—22—22。

干也得干，谁让你共产党员呢？！”¹

还是这句话好使，要是一开始就抛出这么一句话，可能根本不需要来回折腾了。

王殿明五十年代初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历多难的革命年代，目睹共产党建政艰辛，王对新政权带来的安定局面极为珍惜，可以说，他是抱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加入党组织的。这种信仰与他为人行事的原则融为一体，造就他大公无私、认理不认人的性情。“谁让你共产党员？！”这句话一下子触动了王殿明的内心。“别人不敢接手，难道我作为共产党员也知难而退吗？不行！”²王殿明同意了。

1971年3月，莱阳县革委会生产指挥部正式批准，成立赤山硫酸厂。当时的建厂原则是公社出人，县财政出钱。为此，赤山公社从各生产队抽调100人到工厂做工。³当然，工厂的一把手是由县委调派的国家正式干部，他不负责具体生产，却是一种时代象征，代表着政党对工业的领导。

文革时期的中国，从微观经济方面来看，工矿企业首先是一个把“无产阶级专政任务落实到基层”的政治单位，生产是服务于政治目的的。工矿企业的经营整体上处在一种“计划不讲科学，生产不讲效率，管理不讲制度”的状态中。⁴一把手几乎不需要了解生产的具体事宜，这暗藏了普遍的问题。王殿明对化工生产的技术困难早有心理准备，然而，比技术问题更难处理的，却是扯不断的人事纠纷。

王殿明担任工厂车间主任后，开始负责全厂生产工作。实践出真知，没有化工生产知识，王殿明就在实践中不断学习。为此，他既肩负着生产大局的统筹安排，又常年奔走生产一线。众所周知，硫酸生产是有危险的工种，当年硫酸厂设备简陋，没有先进的防护设施。王殿明因常年接触有害气体，逐渐患上轻度支气管炎。身体既然患病，就不适合再工作了。况且按照轮换工的政策，本来也需要期满轮换新工人。但轮换只是口号，工厂不可能将刚刚上手的熟练工人轻易退回村庄，更不会轻易辞退主持大局的王殿明。毕竟，除他之外，其他人很难撑起全场的生产管理工作。因此，党支部书记坚持让他带病工作。这一干，就干到了1983年。

硫酸厂刚刚生产的最初几年，效益一度很好，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莱阳县化工产品紧缺的局面。然而好景不长，工厂生产很快陷入艰难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前所言，赤山

¹ 口述者王殿明（1931年—2018年），2017年1月27日，莱阳市万第镇高格庄。

² 口述者王殿明（1931年—2018年），2017年1月27日，莱阳市万第镇高格庄。

³ 《莱阳县第二化工厂简史》，1986年1月3日，莱档22—1—26—1。

⁴ 王海光：《时过境未迁——中国当代史采薇》，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23页。

公社北部虽有磷矿，但存量少，成分杂，在化工技术并不先进的年代，出产产品的质量难言优质。可以看出，在1970年前后的经济冒进中，仓促上马的很多企业基本没有长远规划。另一方面，王殿明个性耿直，与工厂一把手很难和谐。一把手作为政党象征，不需要懂得生产技术，却常常干预生产。王殿明笃信共产主义，恰恰看不惯党内部分人不切实际的“官僚风气”。“共产党的政策没有错，好经就让这些和尚念歪了！”¹王殿明逐渐产生了这样的思想意识，这种意识没有动摇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反使他坚定了与不良习气做斗争的信念。十多年间，王殿明与一把手关系始终僵硬，这种潜在的矛盾影响了王晚年的命运。

从中国大环境来看，到了1970年代末期，农业集体化步入尾声，多数社办企业面临着生产困境。文革结束后，中国各方面发展百废待兴，一时间，高层关注点难以面面俱到。这一时期，知青安置成了牵动高层的重要事情。政党并没有能力切实安置返城青年，只得允许“待业青年”自谋生路。²这种背景下，亦农亦工问题自然成了政策考虑的次要问题。于是，效益不好的社办企业纷纷出现了裁退大潮。

生产形势严峻，县委领导不得不考虑工厂改革问题。1983年2月，县里指示大小企业都实行承包改革。³赤山硫酸厂也随即开展了投标承包工作，然而，没人敢于接手这个摊子。工厂党支部书记火急火燎，召开全厂大会时，干脆直接宣布：“工厂今年的生产，还得由老王（王殿明）来承包。”⁴王殿明因支气管病，实际不愿意接手。但面对全厂生产困难的现实，想想自己十几年艰苦奋斗的成果，只能迎难而上。然而，工厂先天条件实在不足，所有制的调整的确催生了小小的生产高潮，但不过是行将就木前的回光返照。新的变革已经势在必行。

大变革的确如春潮涌动，乘时乘势。1984年，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报告，要求逐步降低固定工的比例，大大提高临时工、季节工的比重，并提出积极推行劳动合同制。⁵随即，莱阳县于1984年开始逐步实行合同制工人改革。⁶这是一次大改革，起码对亦工亦农群体而言，这次改革关乎个人与家庭的生计。新的冲突随着改革的兴起逐渐发酵。

¹ 口述者王殿明（1931年—2018年），2017年1月29日，莱阳市万第镇高格庄。

² [英]罗纳德·哈里·科斯、王宁著：《变革中国》，徐尧、李哲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

³ 《莱阳市第二化工厂简史》，1981年1月3日，莱档22—1—26—1。

⁴ 口述者王殿明（1931年—2018年），2017年1月27日，莱阳市万第镇高格庄。

⁵ 赵紫阳：《赵紫阳文集》第二卷，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88页。

⁶ 《莱阳市志》，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第507页。

据统计，当时莱阳全县共有计划外招工约 7500 人，约占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三十。¹县委考虑到，这部分人多有几年、十几年的工作经历，已经成为工业生产不可忽视的力量，有必要将他们纳入国家计划。同时，也有必要将农村私拉乱招，不合条件的其他劳动力清退出去。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合乎亦工亦农者的期望，毕竟，他们长期没有被列入劳动计划，各方面待遇不够明确，心里不踏实。根据这种原则，莱阳县对不同时段的亦工亦农采取了不同安置办法。²

安置的过程想必困难重重，一个重要的困难，可能是工作岗位数量匮乏，不足以安置过多的亦工亦农人员。供需矛盾的尖锐，使县政府在具体安置中不得已采取了权宜措施。这种权宜的处置，恰恰落在了赤山硫酸厂的工人身上。

1985 年 5 月 23 日，莱阳县政府宣布赤山硫酸厂关停。在如何安置这批亦工亦农的问题上，由于岗位紧缺，县委决定干脆一次性发下补助金，强行辞退了事。一次性补助费的发放标准为：工龄每满一年，发给一个月的标准工资。³

这自然不能满足工人期望，尤其年富力强的工人，毕竟这将失去未来更多的工资收入，更重要的是失去退休后的一切福利。于是，工人与化工局展开了拉锯战。亲历这次改革的一些职工回忆，莱阳县化工局局长、副局长拿着山东省 1981 年的一份文件念给工人听，想用政策为辞退工人的决定撑腰。但工人不吃这一套，纷纷要求用 1985 年的最新文件落实安置工作。化工局干部则反驳：1985 年没有相关政策文件，新文不下，旧文照样有效。

新文件到底有没有制定呢？工人不清楚，王殿明也不清楚。1985 年秋收结束后，不少工人来到王殿明家里，希望这位领头人能替大家做主。王殿明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弄清到底有没有最新的政策文件。于是，他派四人乘车去了烟台劳动局，发现确实有最新的文件。他们连夜抄写五份，留作证据。

证据在手，县委无话可说。王殿明组织的这次越级行动，也使莱阳化工、劳动部门的干部极为被动。无奈之下，县委为这批亦工亦农者做了安置工作。

然而，为工厂出力最多、资历最老、能力最强，而又身患疾病的王殿明，却唯独没有得到安置。

¹ 《程××同志在全县企事业单位整顿改革计划外用工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5 年 6 月 22 日，莱档 22—1—24—7。

² 《莱阳县劳动局关于整顿、改革计划外用工的报告》，1985 年 4 月 23 日，莱档 22—1—24—2。

³ 《莱阳县劳动局关于关停企业莱阳县第二化工厂亦工亦农人员转招为农民合同制工人的报告》，1986 年 1 月 3 日，莱档 22—1—26—1。

三、记忆幻觉的情感需求

2015年初，我开始关注这个微观案例，农民的评议给我带来了许多思考：

“公理公道地说，王殿明冤不冤？确实冤。可这个人不识时务啊！”很大程度上，这代表了农民对王殿明的评价。¹

“你去和国家干部斗有什么用，工厂一倒，人家说调走就能调走，不受影响。好好记着这句话，得罪了上级，没有什么好果子。”这是基层干部从王殿明经历中得到的感悟。²

无论是基层干部还是普通百姓，大家谈起王殿明的人生经历，都佩服其德性，惋惜其遭遇，同时又深化了“识时务者为俊杰”的认识。农民所谓的识时务，就是民不与官斗，得过且过，该顺着上司就顺着上司，不要钻牛角尖。王殿明的工作安置，大体经历了这样的风波。

1986年4月，赤山硫酸厂的工人安置完毕后，王殿明找到莱阳劳动局，要求给自己也安排工作。劳动局答复不能安排，一个重要理由是，王殿明的年龄已经超过政策规定的界限。根据1985年清理整顿计划外用工的文件，符合男50周岁、女45周岁以下的亦工亦农者可以转为合同制工人。³按照这一硬性规定，王殿明确实超过了年龄界限，他1931年出生，那时已经55周岁。

王殿明认为这种毫不通融的条款显然含有打击报复成分，因为自己组织生产时候得罪了工厂一把手，组织工人越级上访，又得罪了县委的一些领导。“我十几年带头生产，给这个厂子出了多少力！说不安排就不安排了？！”王殿明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随后几年，他不断找莱阳县、烟台市，甚至山东省的有关部门上诉，倾诉对“卸磨杀驴”行径的不满。1993年，烟台市劳动局对这个问题做出新的决议：根据1985年清理整顿计划外用工的文件，符合男50周岁、女45周岁以下的亦工亦农者可以转为合同制工人，王不符合。但鉴于其属于老工人，对工厂有一定贡献，照顾为其转招一名子女为农民合同制工人。于是，王的女儿被安排在莱阳县绢纺厂工作。

村民觉得，两头都做些妥协，就这么了结得了，也算说得过去。但王殿明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他认为该怎么地就得怎么地，应该给自己办理退休手续。王殿明觉得自己的冤

¹ 口述者姜作晓（1940年—），2017年1月26日，莱阳市万第镇高格庄。

² 口述者孙锋年（1960年—），2016年12月13日，莱阳市河洛镇冶房村。

³ 《莱阳县劳动局关于关停企业莱阳县第二化工厂亦工亦农人员转招为农民合同制工人的报告》，1986年1月3日，莱档22—1—26—1。

屈这几年没有及时解决，反倒激发了一些新问题：他的妻子这期间生病，无钱医治；儿子在与父亲前往莱阳县讨个说法时，与领导发生冲突，精神受刺激，留下后遗症。王殿明认为这一连串的家庭不幸，都跟1986年安置事件有关。仅仅为自己女儿安置一份普通工作，远远不足以抵偿这期间的家庭损失。1993年之后的二十多年，他为此事数次前往北京上访，因此成为当地截访的重点对象。后来改用托人写信的方式上访，仍是泥牛入海。

工作安置与办理退休的受挫，使王殿明将一肚子怨气发泄在村庄政务上。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三提五统”的泛滥引发了颇多民怨。这期间，王殿明从来不交“三提五统”费用，一方面，自己家庭状况确实拮据；另一方面，他认为这种抗拒是理直气壮的，他对党的信仰始终不变，抗拒的只是基层干部的胡作非为。村干部鉴于王殿明多年对村庄的贡献，同时理解他的曲折经历，也就默许了他的拒绝。村民也多会体谅他的境遇，并不在这种不合作上说三道四。乡村变了，世道人心还有。

2017年末，当我再次来到王殿明的家中，他用颇带神秘的语气悄悄跟我说：“刚才去邮局查了查，前几天写的信中央已经收到了。”我不知该做劝慰还是鼓励，经历了太多挫折后，他的信仰始终不变，这种信仰，成了维系风烛残年的唯一力量。

多年的访谈经历让我意识到，中国农民常常信命，尤其人至晚年，回顾人生坎坷时。缺乏宗教信仰的中国乡村，农民的宿命意识多是人至晚景的自我慰藉。这种宿命论不同于马克斯·韦伯的“得救预定论”。信奉加尔文教的欧洲人在“得救预定论”的激励下，促发了资本主义得以发展的精神力量。¹而中国农民收获的，不是早年的精神激励，只是晚年的精神慰藉。

王殿明不信命，这反映了他不同于大多数农民的个性。但当我提及性格决定命运的问题时，他沉思良久，还是肯定了这句话的道理。我问：“现在绝大多数人都按人情世故办事，大环境就是这样。很多村民对你的评价是‘抗上’、‘不识时务’，你有没有感觉自己过于较真？”

王的回答是：“就是得按照原则办事，我没有对不住党的地方，要说对不住什么，我对不住自己的老婆孩子。”“党的政策还是好的，被下面当官的办坏了！党能给我解决问题！！”²

耿介之士，命途多蹇。在信仰与现实难以契合的时代，王的性格早就预示了命运的坎

¹ [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² 口述者王殿明（1931年—2018年），2017年1月29日，莱阳市万第镇高格庄。

坷。个人的冤屈，又何尝不是一个时代的纠结。

我们重新回到开篇那次“革命闹剧”的记忆幻觉中。

雨果曾说：“大众关于一些人的传说，无论是真是假，在他们的生活中，尤其是在他们的命运中所占的地位，往往和他们亲身所做的是同等重要的。”¹人对记忆的虚构，同样也是这个道理。人无法用遗忘消除痛苦，只能希望使痛苦显得伟大和光荣。

我不知道王殿明后半生的坎坷与“革命闹剧”的记忆幻觉有多大程度的关联，但可以肯定，人至晚年，经历的坎坷使人需要在回忆过往中寻找某种心理慰藉。这种慰藉，除了抚平当前心灵的某些创伤，大概也可以缓解人对死亡共有的恐惧。死亡的临近，在现时和生存中挖出了一个虚空，这虚空正是记忆幻觉的来源。正如阿德勒对个体心理分析所显示的，最沉重的精神压力与对无法达成目标的畏惧，很容易让人产生幻觉。²

记忆的重复与幻觉的制造，似乎被赋予抵制死亡来临的意义。在这幻觉中，记忆发现自身的影响可以拥有无穷尽的资源。这种抚平创伤、缓解恐惧的需求愈强烈，人在追溯过往的思维活动中，越会有意无意地添加某种虚幻的色彩，这种虚幻的色彩，往往包含英雄主义的激昂悲壮。人选择向虚拟现实的魅力屈服，寄情于自我幻想，这纵然不切实际，却更能与人安慰。王殿明在回忆亦工亦农的坎坷时，过于沉重地强调苦难与冤屈；在回忆更早时期的村庄建设中，则不无亢奋地强调自己的各种成就。文革的那场记忆幻觉，只不过是当年辉煌经历中的高光时刻。

我无法确定王殿明的幻觉生成于哪个时刻，但可以推测，随着时间推进，这些幻觉不断被精心打磨，就好比一场话剧经历数次彩排、不断修改一样。心理学家通过对人的记忆研究表明，若一个人反复思考某一事件，便会增加他相信这件事发生过的确信程度。³讲述者的阐述在幻觉的修改中逐渐根深蒂固，而且似乎可以推断，这种讲述是面向特定听者的。

涂尔干认为，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过去的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出于必然，这个过去的人在我们身上占主导地位，因为与这一塑造我们和产生我们的漫长过去相比，现实委实微不足道，只是我们并不感觉到这个过去的人，因为年深日久，此人已扎根于我们，他是我们身上的无意识部分。因此，人们往往无视其存在，也不考虑其合法要求。⁴

¹ [法]维克多·雨果：《悲惨世界》第1册，李丹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4页。

² [奥]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洞察人性》，张晓晨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第40页。

³ [美]丹尼尔·夏克特：《寻找逝去的自我：大脑、心灵和往事的记忆》，高申春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01页。

⁴ [法]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79页。

荣格表达过类似看法，他说：“幻觉本身具有心理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丝毫不逊于物理的真实性。”¹同时，他进一步用海岛做比喻，认为如果将高出水面的部分代表意识，水面下由于潮汐运动而显露出来的部分则代表个体无意识，而所有孤立的海岛的共同基础——隐藏在深海之下的海床，就是集体无意识。²按照荣格的分析，记忆幻觉大概属于一种个体无意识，这种无意识有的时候具有心理真实性，以至于回忆者有时难以发觉它的虚假性质。当然，“潮汐”退去，个人无意识的岛屿也会逐渐显露，这就意味着，在某些时候，回忆者又能够意识到自己记忆的虚幻。

那么，王殿明关于文革的记忆幻觉，是否曾被自己意识到呢？

在我意识到王殿明虚构了记忆幻觉之后，便抽丝剥茧地进一步探究。大年初二的傍晚，王殿明的儿子正在做“送年”饺子。很少插话的他突然反常地抛出一句话，以此阻止我的深究。他说：“乃老爷爷年纪大了，身体也有病，不能长时间聊天……”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这句插话可能蕴含的意味。在后来对访谈的回忆中，我才渐渐体会到这句话的特别。

在我长期对王殿明的访谈中，从来都是他占据话语的主导地位，他的儿子有时候在旁倾听，偶尔试图纠正父亲的记忆错误。但每当他要张口，王殿明便不乏威严地默默抬起拐棍，示意他住口，并附带一句：“干你的事去，你知道什么？！”这简单的话语与动作，暗示王虽老矣，威严尚在。也就是说，王的儿子很少有参与访谈的机会。但大年初二的插话，却丝毫没有引起王殿明的反感，这让我意识到，当我尝试探究记忆幻觉，寻求历史真相与记忆变形的真相时，王的儿子意识到这种探究可能带来的后果——心理慰藉的记忆幻觉要被外来力量戳破。而同样意识到这种危险的王殿明，默许了儿子对这种探究的阻拦。我意识到，在长时间聊天过程中，王的儿子以一种消极参与的方式共同制造了记忆幻觉。

虽然在心理学与神经科学领域，人们发现大脑额叶功能的衰退带来老年人记忆的困难，使他们难以回忆过去的细节，并且使他们易于受到记忆幻觉的影响。³但就王殿明的这段故事而言，他并非没有意识到自己记忆幻觉的存在。更多时候，即便这种记忆是一种纯粹的建构，它确实是一种被直觉和主观认为是真实的感知。⁴记忆也会夸张，反复重复着某种符

¹ [瑞士]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冯川、苏克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年，第97页。

² [瑞士]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冯川、苏克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年，第2页。

³ [美]丹尼尔·夏克特：《寻找逝去的自我：大脑、心灵和往事的记忆》，高申春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18页。

⁴ [德]阿莱达·阿斯曼：《记忆中的历史：从个人经历到公共演示》，袁斯乔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页。

号，以确定那种幻觉的存在。¹理智常常无力与其斗争，它的艰难尝试只能增加记忆幻觉的魅力。当外在的力量试图闯入这种幻觉当中，记忆的个体往往表现出高度的警觉。我们很难将这种记忆幻觉解释成“自欺”与“欺骗”，如同阿莱达·阿斯曼所言，这是一种“通过其间获得的阐释模式”而进行的回忆，这种阐释在建立个人身份认同时，对记忆的加固发挥了重要作用。²

这里可以进一步探讨一个问题，记忆的自我呈现，往往因为身处环境的不同而呈现隐秘的差异。³我相信，王殿明在一个人回忆过去的时候，即便他在默默地打磨记忆幻觉的细节，以备未来对特定群体阐述，但他对于过去历史有另一套近乎客观的记忆保存。当他单独与我进行谈话时，记忆便呈现出本文探讨的记忆幻觉。当他与自己的亲人同时向我陈述时，他们继续阐述着这种记忆幻觉，并心照不宣地维护着幻觉。当访谈场景中再加入其他邻里乡亲，记忆的幻觉便小心隐退下去，邻人与王殿明本人会很自然地形成一种阐述默契，即他们向我陈述的重点，不再是记忆的幻觉，而转为亦工亦农期间承受的冤屈。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传奇与秘密，传奇不断被提及，而秘密则隐藏在阴影里。

四、并非多余的话

有一个问题仍然得不到解答：在这个记忆幻觉中，王出人意料地虚构一位从哈尔滨回来的青年，这个青年的意象大概不会凭空产生，那么，在王殿明早年经历中，哪些经历与“哈尔滨”、“当兵”有某种关联呢？这个问题也许不会得到进一步解释了，因为在访谈后期我便意识到，每一步更深层次的挖掘，都好比对受访者的严苛审讯，这种挖掘，将使他建构的观念世界的平衡感受到冲击。这实际涉及历史人类学的研究伦理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历史终究是充满缺憾的艺术。

大体完成文章记述后，我有挺长一段时间没有再进王的家门，其间重返乡村，偶尔也从村民口中探听消息。据说，王的2017有些不顺，比如，年老体衰的他不慎骨折，再比如，他的儿子出现了间歇性精神亢奋。

2017年国庆，我在重返乡村的巴士上偶遇王的儿子。他叫王永文，半路上车时，并没有发现前排的我。我本想打个招呼，看他上车后直奔后排，索性也就保持了沉默。他随身

¹ [澳]乔纳森·福斯特：《记忆》，刘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年，第13页。

² [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北大出版社，2016年，第292—293页。

³ [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黄爱华、冯钢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0—35页。

携带了一个播放京剧的扬声器，乍一见，似乎颇有怡然自得的生活情趣。可没过多长时间，他的精神亢奋便在不大的公共空间中制造出各种烦乱。王永文落座后，不停地搭讪售票员、司机、邻座乘客。他大嚼气味浓重的咸干鱼，一路腥气，并拾起别人废弃的半瓶子矿泉水喝。他扬言自己钱很多，要赞助身旁的一位学生上学，又声称要上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没人搭理他的时候，就伴着扬声器里的音乐，放声高唱：“说句实在话，我也很想家，家中的老妈妈，已是满头白发……”熟悉的旋律，他唱得很动情，车厢里最初按捺的嘲讽气息渐渐退去了。这样一个人唱起这样一首歌，总是让人隐隐伤感。我静静坐在前排，又尴尬又心酸，五味杂陈。王对自己信仰的主义忠诚不二，只因性情耿直，得罪上司，便吃了一连串哑巴亏。王的后半生几乎是在不断伸冤中度过，如今风烛残年。儿子又如此状况，让人不得不感慨，人似乎很难掌控自己的命运。

我没有再见过王。据说，他仍没有死心，有村民在县城见过他，见到王的时候，他正使着老劲，挥舞手中的拐杖。见人就挥，嘴里唔噜唔噜，大概是发泄对贪官当道的不满。

因为差不多完成了这个写作，我就没有再见王的心思，这是一个带有自私的念头。我给自己的理由是，见到他的时候，他还会翻来覆去讲述英雄主义的记忆幻觉。

2018年的春天，王殿明离开这个世界。 ■

【评论】

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对敌斗争的哲学大纲

安希孟

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阶级分析，起初依财富多寡，越多越反动。没收完了，就看知识学问，知识多学问大职称高，就是敌人。知识剥夺之后，检验革命和反动的标准就看是否拥护自己，拥护我的，就是朋友。反对我的，就是敌人，这是千古不易之真理。

被反对，是好事，证明我做得对，也证明对方是大敌，正好可以聚而歼灭之。文化革命中这句话被群众组织无限夸大，变成拒谏饰非的借口。常识认为，被人反对，说明自己

可能有错误，要检点自己。即使自己正确，也不应拒绝批评。对与错，不取决于被谁反对，被谁反对，不是判定真理的唯一标准。文革将这一常识打倒在地——“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冲锋陷阵。你越反对我越一意孤行。

文化革命中，一位苏修“特嫌”被交给我们审查。我们按照指示，让他交待苏修“特务”问题。他说“我不是特务”。我们说：“革命群众说你是特务，而你自己否认，那就等于说革命群众眼睛不是雪亮的。这分明是污蔑革命群众。”这位老师进入两难困境：他若承认自己是特务，他于是有罪；他如果否认自己是特务，对抗审查，他仍然有罪。我们自己则稳操胜券：你若承认是特务，你是特务；你不承认是特务，那也没关系，你对抗运动，同样是特务。同样的问题，他不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严密推论：你若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好。你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你若否认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就愈加证明你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没有“问题”，可是单单态度，就又是“问题”，就具有独立的本体论地位。没有“问题”，反倒成了“问题”本身。这是什么逻辑？“问题”不大，但态度倨傲，“问题”于是就大了。

1970年，在北师大，最大的最彻底的一次抓坏人的斗争，是抓五一六，是抓“抓过坏人”的人，是斗“斗过坏人”的人。当年意气奋发“斗人”的人，如今挨斗。场面同样非常壮观激烈残酷。又一个莫须有的反革命阴谋集团浮出水面，曾经游行打砸不可一世的小将们，如今成了落水狗。和过去一样，参与斗争的人们各个摩拳擦掌奋勇当先，用放大镜遍地寻找敌人。和过去一样拍桌打凳挥拳怒吼。不同的只是角色互换——过去整人者如今被整。曾经被整者，这次成骨干依靠力量做打手。乱混混你方唱罢我登台。

在北师大，与阶级敌人斗之余，就是备战备荒挖地洞。现如今各城市用做客栈创收的“地下宫殿”，成为武汉百姓纳凉避暑的好去处的防空洞，以及大白天缓缓下沉塌陷的山西人民医院大楼，都是那时的杰作。■

【评论】

顾准对《自然辩证法》的追求

王晓林

顾准在1959年的一篇日记中写道：

“无论如何，辩证法作为认识过程的描绘与认识规律则可，作为世界图式则不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公布对恩格斯本人来说是一件遗憾的事，那里充满着黑格尔的图式向自然界头上套下去的片断。80年代前恩格斯曾有此企图，无论如何，费尔巴哈论以后，他是一直没有理睬那些片断旧稿，而那些片断旧稿的观点，与费尔巴哈论也是不符合的。”

（日记 59.3.5）

假如把“自然辩证法”比作一颗洋葱，那么这颗“洋葱”被顾准穷追不舍地剥了十多年，到了1973年8月，顾准和兄弟陈敏之讨论辩证法问题的通信显示，他已经彻底剥出了它的胚芽，看清了它的来龙去脉：被封为“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组成部分”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最初只是一篇书评，是1859年8月后者为前者《政治经济学批判》写的书评。而这篇书评——

其基本的调子和三十年后的“On Feuerbach”是一模一样的。

甲、它首先提出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个名词，而在1859年以前马克思的文献中没有见过。以后也没有见过；

乙、它提到了毕希纳、福格特和摩莱肖特，这些名字准确无误地重复出现在“On Feuerbach”上面，这些都是Engels（恩格斯）认为从Hegel（黑格尔）倒退之处；

丙、它要求发展一种“比之前所有的世界观都更加唯物的世界观”，同时又强调 Hegel 体系的巨大的历史感的基础，并要求改造 Hegel 体系中的“从无通过无到无”的特点，并把这种唯物的世界观同 Hegel 思想结合起来。

正是这三点，就是后代哲学家赖以建立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地方。也正是这三点，使 Engels 晚年从事他那未（《顾准文存 顾准笔记》此字作“么”，与前后文不通）完成的《自然辩证法》，企图以这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治整个“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笔记，页 597）

必须花一点笔墨，先把顾准文中“On Feuerbach”的概念弄清楚。

1845 年马克思著《费尔巴哈论纲》一文，但生前从未发表。马克思去世后五年的 1888 年，《论纲》作为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附件第一次面世。在中国，恩格斯此书被简称做《费尔巴哈论》，英译也是“On Feuerbach”，令人极易与马克思 1845 年所著《费尔巴哈论纲》相混淆。顾准的文字每每论及此话题因为大多使用英文，也不免令人有混乱之感，但如能认真阅读前后文还是能够分辨出他何处指马克思之《论纲》，何处指恩格斯之《论》的。上面所摘他的笔记，“On Feuerbach”所指无疑是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而非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纲》，仅从“三十年后的”这个定语即可确定。

还有一点不得不提到，世界马恩研究学界一直就有一种说法——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纲》有两个版本，一个是马克思 1845 年春写下的原本，一个是四十多年后恩格斯的修改本。两个版本在一些至关重要的哲学论点上存在着重大差别。

话说回来。关于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越俎代庖”，顾准一向颇有微词，又尤以这一部《自然辩证法》为最。本文开篇引用的顾准日记，紧接其后的一句话是——“Adam Smith（亚当·斯密）临死前要求人家把旧稿完全烧光是必要的”（日记，59.3.5），明显是在埋怨恩格斯的不审慎。”

在多年反复阅读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纲（十一条）》、《政治经济学批判》、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及附后的马克思《费尔巴哈论纲》，他心中更有底了：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自然辩证法》跟卡尔·马克思先生的辩证法哲学，至少“差别是极其显著的”（笔记，页598），是前者的一部未完成且“分明是不想发表的草稿”，连马克思生前能否同意“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都很可疑。

其起源仅仅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书评的这部著作，竟“企图以‘比之前所有的世界观都更加唯物’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治整个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笔记，页598），顾准刻薄地将之称为“妄想”和“梦呓”。

从《书评》到《费尔巴哈论》，顾准看出是恩格斯“妄想用一种什么哲学体系来将自然界一以贯之”，他不禁大吃一惊。

吃惊的不仅仅是中国人顾准，生下这一“巨蛋”的母鸡也被自己的产品吓住了——连恩格斯自己也自嘲地说他是在“跟杜林啃酸果”，并且宣称这是“从Hegel（黑格尔）后退了一步”。可这并未妨碍他在著作中宣称“自然哲学告終了，凡想复活这一哲学的一切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后退的”。

但奇怪的是写下这部书的恩格斯却迟迟不愿发表，直至去世，它依然是一部手稿。恩格斯去世于1895年，是时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已成气候，假如恩格斯愿意，这部手稿的出版是毫无问题的，但他并不愿意。

恩格斯对这个被自己称作“酸果”的东西是不自信和不确定的。

七十多年后顾准看出了这种不自信和不确定——这颗“包括了严重的自相矛盾”的“酸果”纯粹就是“妄想”和“梦呓”，最初的梦呓者是黑格尔，“杜林跟着效法，更是梦呓”，到了恩格斯跟着杜林再“啃”下去，一半是“也还想要搞出一种指导科学的哲学来”，一半是“不得已”（为何不得已，顾准没有说明）。也正因为此，恩格斯分明是不打算发表这手稿的，况且“文字”不是“行为”，尤其是作者生前根本无意发表，也没有授权、授

意死后发表的文字。

也确实在他死后的三十年内，后来形成此书的手稿都没有发表，但是不幸，他也没有在生前销毁。

到了1920年代，深藏在故纸堆里的《自然辩证法》被苏俄孟什维克（少数派）哲学史学家德波林“硬挖”了出来。他如获至宝，立即“大肆鼓吹”，“想抬出恩格斯增加哲学的权威，要用哲学来指导一切”。

“那是一场悲剧”，顾准说。

悲剧归悲剧，布尔什维克（多数派）的斯大林却“不能忍受（德波林的）这份狂妄”。这只被杜林、恩格斯和德波林相继啃过的“酸果”最后被斯大林抢到了手。

“斯大林……把（这个）哲学武器没收过来，成为‘斯家政治’的工具，其结果就是《联共党史》中有名的那份《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幕，已经是喜剧了。”（以上凡未注明出处的黑体字，均出自文稿 P449-450）

顾准将之嘲讽为“梦呓”和“妄想”的这颗酸果，就这样修成了正果。

几乎在顾准剥洋葱的同时，毕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的英国人戴维·麦克莱伦写出了一部新的《马克思传》。1972年，也就是顾准从劳改的息县干校回到北京那年，它的第一版出版，后来多次再版。这是继1918年以德文原文首次出版梅林的《马克思传》后的第二部涵盖马克思一生各个方面的英文版传记。2006年它的最新版本（1995年版）译成中文，被中国人誉为“英语世界最权威的马克思生平、思想研究文献”。

该书在谈到马克思最后的十年里与恩格斯的某些区别时，再明确不过地作了如下表述：

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马克思变得越来越接近在当时知识界流行的实证主义。这一倾向，开始于《反杜林论》，在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自然辩证法》中得到延续，并在苏联教科书中的辩证唯物主义达到顶点。正是这一倾向，代表着作为哲学世界

观的马克思主义，其内容是客观规律，尤其作为实在的基本要素的、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物质的辩证运动的规律。这与诸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的例证迥然不同。恩格斯一直有着这种对自然科学范型的倾向，马克思却并非如此。例如马克思对达尔文主义持有更多的保留态度。（该书，页442）

作者在紧接着讲述了一件轶事——马克思希望把《资本论》第二卷献给达尔文，却被后者以“接受一位公开的无神论者的著作会伤害家人感情”为由婉拒后，紧接着话锋一转：

但这只是表明马克思很欣赏达尔文的著作，并不说明他用了与达尔文研究自然一样的方法着手研究历史。因此，恩格斯在他那篇著名的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讲中把马克思和达尔文的观点等同起来，是极大的误导。（该书，页445）

无疑顾准看出了这种“极大的误导”，不但自己未被误导，还要像那位英国人戴维一样指出这种误导——“……Engels（恩格斯）本人的哲学思想，先知的成分本来就稀薄很多，所以，“定稿”性质的 On Feuerbach 强调唯物主义，强调真理的历史性和人类进步的无限性，而避免像 Hegel 那样的体系化。”（笔记，页696）

不过相对于这种类型的在重大政治哲学命题和理论上东、西方思想家不谋而合的重大意义，“不厚道”暂时可以忽略不计。在此，无非西方人戴维用了十分规范的哲学行话——动词“范型”，东方人顾准用的是不规范的名词——“图式”和市井一些的动名词——“套”罢了，内涵是一样的。在一个封锁、闭关的时代和国度，这种不谋而合尤其显得不可思议和弥足珍贵。

顾准对俄国人在历史学和哲学上的蛮横，他甚至用了十分极端，也不大雅观的“强奸”一词——

埃及、巴比伦等所谓“东方”，没有希腊罗马的奴隶制，这一点马克思是知道的，所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在古典的即奴隶制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之外一定要加上一个亚细亚的。把马克思的奴隶制扩大到“东方”，取消“亚细亚的”这个范畴，恩格斯做了一小部分工作，到斯大林就斩钉截铁地不准谈“亚细亚的”，于是对马克思，亦即对历史的强奸完成了。（文稿，页300）

把某些“图式”形式的命题规定为人们思考必须依据的教条，控制一切思考的表达方式，这种作法只会产生一种结果，那就是将人置于一种绝对的，毫无掩饰的暴政之下。顾准一生都在致力于摆脱“教条”这架制动器，他绝不允许别人在自己“脑子里跑马”，而要自己在自己“脑子里跑马”，谁要是想给这匹马上“套”，难！

什么叫“让思想冲破牢笼”？无非就是他这样，在自己脑子里的“跑马”吧。

来看看这“马”怎么个“跑”法：“在中国”，他接着说，“这幕喜剧排演了而未上演。曾经有关于‘坂田模型’的圣旨。这是一种包罗自然哲学体系在内新哲学体系的酝酿，为此，还有于光远指导下的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你读了杨振宁与记者的谈话了吧？这种新哲学体系，现在大体收场了，不想演出了。这幕不会演出了的喜剧，更是喜剧化的喜剧”。

（文稿，页450）“坂田模型”在当年（1960年代中期）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界也算是个不小的事件。坂田者，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1955年发表了著名的基本粒子“坂田模型”——按照物质无限可分的唯物辩证观点，他批判把基本粒子看成物质始原的错误观点，认为基本粒子也是可分的，并提出了一个基本粒子复合模型，亦称“坂田模型”。

“坂田模型”因为与《庄子》“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说不谋而合引起极峰极大的兴趣而迅速在中国哲学界走红。伟人亲切接见了这位“建模”人并口传“圣旨”——“你的文章写得好啊”，授意大肆宣扬。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立即组织了一彪人马，中科院成立了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创办了《自然辩证法》刊物，准备开展大规模研究，期

望能建立中国自主研发的、包罗自然科学哲学体系在内的新哲学体系。更有甚者，中国哲学界竟以此为据，以“物质无限可分”说划线站队，这就是著名“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阶级斗争学说。持“无限可分”说者是革命的，例如日本理论物理学家坂田先生，持“不是无限可分”说者是反动的，例如中国理论物理学家刘耀阳先生。

中国此刻太需要自己的黑格尔、马克思了，至少要有“自己的恩格斯”吧，否则怎样取代已经“修了”的老大哥，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呢？正在此时，华裔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出现了。正是这位真正的粒子科学家牵出了“自然律在哲学上的重要性是否为人所夸大”、“规律和归纳”、“或然还是必然”等等巨大的夹缠，尤其是带来“相对论”创立者，伟大的爱因斯坦对《自然辩证法》一文无情的否定——

爱德华·伯恩斯坦先生把恩格斯的一部关于自然科学内容的手稿交给我，托付我发表意见，看这部手稿是否应该付印。我的意见如下：要是这部手稿出自一位并非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而引起注意的作者，那么我就不会建议把它付印，因为不论从当代物理学的观点来看，还是从物理学史方面来说，这部手稿的内容都没有任何特殊的趣味。可是，我可以这样设想：如果考虑到这部著作对于阐明恩格斯的意义的意义是一个有趣的文献，那是可以勉强出版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

以及，在俄国人看到爱因斯坦此言后极为恼怒地指责伯恩斯坦并未将恩格斯手稿全部送给其阅读而仅仅送去了一部分时，爱因斯坦亲笔写信给美国哲学家悉尼·胡克、再一次坚定而明确地表明了自己态度：

爱德华·伯恩斯坦送来全部手稿要我出主意。我的评价是对全部手稿而说的：我坚信，要是恩格斯本人能够看到在这样长久的时间之后，他的这个谨慎的尝试竟被认为具有如此巨大的重要性，他会觉得好笑。（悉尼·胡克《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

这位真正的自然科学家给也想跟着“啃酸果”的人们兜头浇下一盆冰水，令正在兴头上的中国人大失所望。不过也可能是他们忙于更高层次的唯物辩证运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项目的前期准备，反正“模型”无疾而终，如今也鲜有人还记得坂田昌一先生。

更有趣的是，几十年前中国人几乎个个耳熟能详的“自然辩证法”一词越来越落寞沉寂——早在1980年代初，它就逐步被“自然科学哲学”排斥和替代了，成立于1956年的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研究组”也悄然将名号改作了“科技哲学研究室”。

难道人真能发现这个世界绝对的、普遍的规律吗？

Tolstoy（托尔斯泰）说得对，人的自视是分数中的分母，分母值愈大，分数值愈小。居里夫人说“砂子”，我实在不由得敬仰她！（文稿，页450）

常被人认为“自视甚高”的顾准，却在哲学的层面上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自视甚高和夜郎自大——“自然界如此浩瀚广阔，丰富多彩，你能添一粒砂子已经很难了，你妄想用一种什么哲学体系一以贯之，那简直是梦呓。”（文稿，页450）他蔑视所有这样的梦呓，更遑论去相信。也正是这种不相信、不盲从、不人云亦云和蔑视，令他戴上了“右派”的荆冠，且成为全国唯一一个两次被戴上这顶荆冠的人。除开“自然辩证法”，他还敢剥“辩证法”这颗格外辛辣的大“洋葱”。

找准了下手之处，他从中国自古有之的古算、周易和始自周朝史官李聃（老子）的“道”，到布莱尼兹的（二进制）电子计算机，从黑格尔“在哲学上的普遍性几达极限”的辩证法三定律到辩证唯物论，笨拙而不懈地剥了下去。

也只有这样的笨人，当他抬起头来时才敢说——

（中国古算、周易、老子的“形式逻辑”、“朴素的辩证法”等）不仅使中国哲学具备十分特殊的性质，也使中国的所谓逻辑具备十分特殊的性质。它既使Leibniz（二进制

发明者莱布尼兹)惊喜交集,也使中国从来不去认真分析事物间的关系,却常常是高度综合的。中国人实在聪明,中国人又实在太不严肃认真……(笔记,页163)

否定的辩证法作为一个普遍命题是不对的。(日记59.2.23);

(《共产党宣言》称)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这)整个是辩证法。它为革命的辩证法挣得了整整一个世纪的荣誉,也就是为马克思主义挣得了整整一个世纪的荣誉。(然而这不是事实)事实是,一切工人们互相联合起来达到最高度的国家,都是资本主义生存未受致命威胁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威胁来自别的方面,并不来自工人的团结。(笔记,页492)

列宁……在辩证法方面实在是无知的(日记59.2.23), (因为他)坚持恐怖主义——专政这个方面……其实各方面是列宁主义,非复马克思主义了。(悉尼·胡克《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

除了“自然辩证法”和“辩证法”,顾准对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集权、专制与无产阶级专政”、“人的异化和劳动的异化”、“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唯理主义与唯物论”、“辩证法与神学”、“自由与民主”……这些极神圣,极辛辣的洋葱头,无一不是像对待《自然辩证法》和“辩证法”一样——一层层地剥皮,一层层地观测、嗅探,全神贯注、潜心涤虑,哪里顾得上擦一擦横流的泪水。

作为一个受过一般教育的中国人,要赶上顾准的节奏和高度是很不自量力的。我的举例也只敢到此。■

本文所有引文均出自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顾准文存》(包括日记、自述、笔记、文稿四本)

【重评经典】

钱广与雷锋

——小议文革中的重拍片《青松岭》

韦陀

《青松岭》有两个版本，一个1965年拍的，一个是1973年拍的。之所以重拍这部影片，原因有二，一、当时的文艺作品，“除了《艳阳天》等几部小说外，‘非黑即黄’，电影剧本的创作来源几近枯竭”；¹二、这部片子在江青眼里还算是比较好的，符合江青所说的重拍标准。

重拍片对原作进行了三方面的改动：首先改变了前一个版本主要英雄人物不突出的缺点。确立了以张万山这一英雄人物为中心进行布局，摆正了他和其他人物之间突出和陪衬的关系。从而符合了“三突出”的原则。其次，强化了阶级斗争。明确了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把刘少奇说过的“不要怕资本主义泛滥”的话，让钱广说出来。还让他散布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消息，并且增加了钱广搞破坏，与地主钱老顺相勾结的戏。²

但是，在确定主演上，遇到了麻烦——按照江青的“重拍片由先前原班人马拍摄”的指示，这部戏的主演应该是李仁堂。可是，当时的李仁堂尚在打倒之列。能否用一个为“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效劳的明星来演无产阶级英雄？这个时代难题在江青那里得到了解决。正在跟着黑帮一起扫大街的李仁堂很快就成了心红骨硬的老贫农的饰演者，并顺理成章地成了毛泽东文艺路线的标兵。

1974年1月，在全国电影制片厂负责人会议上，《青松岭》与《艳阳天》《火红的年代》一道受到了时任国务院文化组组长，后任文化部长于会泳的高度肯定，认为此片的“摄影和采景都比1965年原片好得多”“不用说在思想上，就是在艺术上，从色彩、用光、画面

¹ 翟建农：《红色往事：1966—1976年的中国电影》页211，北京，台海出版社，2001年。

² 《革命电影阔步前进——彩色影片〈艳阳天〉〈火红的年代〉〈青松岭〉评论集》页4，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

处理等各方面看，同文化大革命以前比，也是提高很大，取得了很可喜的成绩。”¹

在文革的重拍片中，此片是个例外。《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渡江侦察记》等都经过重拍，但是人们喜爱的还是老片。唯独《青松岭》的重拍片获得了较长的生命力。

1. 拣榛子：花钱靠自己

在高大泉、萧长春的奋力推动下，农业集体化跨上了最后的台阶——人民公社。高、萧的接班人张万山出场了。他要用“夺鞭”来讲述在一个叫青松岭的地方，社员们为防止资本主义的进攻，上下一心保卫集体经济的故事。

这部影片讲的故事很简单。青松岭地处山区，生产队与外面的物质往来，全靠一挂马车。马倌钱广，中农成分，经常帮助社员把土产山货带到山外的自由市场上去卖。还用“吃饭靠队里，花钱靠自己”的言论怂恿落后社员到上山拣榛子换钱。为了把住鞭杆子，他让拉车的马一到红石口就惊车，而他是唯一能够制服惊马的人。老车倌万山大叔，阶级觉悟很高，看出来钱广是拉着社员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了把鞭杆子从钱广手里夺回来，他强忍老寒腿的折磨，办起了赶车训练班。钱广阴谋破坏，终被识破。调查得知，他是隐瞒成分的反动富农。万山大叔胜利了，鞭杆子回到了贫下中农手中。

落后社员不上工，上山拣榛子是这里的一个重要情节。当时钱广与老四有这样一段对话——

钱广：眼下自由市场的榛子可是缺货，你没闹点儿？

老四：大秋忙月的，哪有闲功夫。

钱广：你上一天工，顶多给你记上十分八分的，要是拣榛子一斤好几块呢。如今吃饭靠集体，花钱还得靠自己。

老四：为拣榛子不上工怕不合适吧？

¹ 翟建农：《红色往事：1966—1976年的中国电影》页223，北京，台海出版社，2001年。

钱广：要不说你死脑筋呢，这阵子是按劳分配。结算的时候你少一份，别人还多得一点呢。

老四：倒也是这么个理。钱大哥，我要是拣回来，你可帮我卖呀！

钱广：放心吧，只要这把鞭子在咱们哥们儿手里。

这几句话透露出农民在集体经济中的真正地位，隐藏着人民公社必然垮台的原因。农民入社以后，就成了人民公社这台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他们不但失去了行动的自由，而且失去了为个人利益说话的自由。“为拣榛子不上工怕不合适吧？”老四这种顾虑来自于集体经济的强制性。钱广对老四的劝说，字字是实话，句句符合政策。但是，一旦放到台面上，就会被视为“把社员往资本主义道路上拉”的反动言论，受到万山大叔一类的积极分子的批判。

社员们的这种情况，经济学家有过精辟的概括：“随着农民财产权最后被否定，城乡隔绝的户籍制、粮票制以及公社内的口粮工分制，都一起完备起来。农民不但不能携带自己入社的土地和耕畜退社，而且甚至不能携带他自身退出此种体制。”¹在既不能“退出”，又无权“叫喊”的情况下，他们只能靠两个办法来反抗。办法之一是消极怠工，出工而不出力。之二是搞家庭副业，建设“鸡屁股银行”。前一个办法尽管不能给个人带来什么经济利益，但足以消弱集体经济。后一个办法是毛时代的农民维护个人生活的最后屏障。他们靠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业来免于饥饿，弄点小钱，以支付日常生活必要的开销。钱广说的“吃粮靠队里，花钱靠自己”是农村普遍的现实。

然而，张万山却另有一套逻辑。只见他语重心长地告诫生产队长周成：钱广摇晃着鞭杆子，要把社员往资本主义道路上拉。

周成是个务实派，他的回答入情入理：“钱广给人们捎卖点山货我看有好处。要不耽误工的就更多了。”

¹ 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国家与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一个经济制度变迁史的回顾》，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5年第6期。

张万山质问周队长：“噢，卖山货就得耽误工，跑自由市场，眼前不就是供销社吗？”如果这话从一个刚下乡的知青嘴里说出来，还可以原谅。张万山，一位长年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与农民血肉相联的老贫农居然能说出这种话来，实在“革命浪漫”的离谱——事情明摆着，供销社是国家办的，它的价格是死的，普遍低于自由市场。把山货卖到自由市场会多得几个钱。这几个钱，对于长期在贫困线上挣扎的社员来说，至关重要。所以，他们宁愿舍近求远。

周队长的解释诚恳实在：“有些人不是想多闹两钱吗？在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不能要求过严。闹不好，会影响社员的积极性。眼下秋收正忙，社员的积极性只能调动，不能打击。”

张万山严肃起来：“你寻思是小事吗？周成啊，针尖大的窟窿会透过斗大的风啊。”这是文革特有的思维方式，它总是把鸡毛蒜皮吹到两条路线的高空上去，同时将阶级斗争注入到生活的细枝末节之中，以使用明察秋毫、洞悉隐微来鼓励张万山一类的时代英雄。让他有更大的干劲胡搅蛮缠。

县委派来的党支书，在重拍片中被降为次要角色的老方充分发挥了绿叶（为虎做伥）的作用：“老周呀，万山大叔说得对呀，社员的积极性是靠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来调动，还是靠迎合个别人的资本主义思想去笼络。这可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呀！”

用经济学家的说法就是，老四等人采取的是“局部退出权”。这是农民对集体制度不满而减少劳动投入的具体表现。“正是这种局部退出权，使农民能够在集体的监督和计量不足以及管理不善的情况下用消极劳动表达不满，并在公有制的体制内通过家庭小经营与大而无当的公有经济竞争。”换句话说，在现实生活中，老四代表了广大农民的愿望，他是在与国家强权斗争，保护个人经济收入。他的作法是正当的，合理的。是应该当到法律保护的。然而，社员们的这一权利，被万山大叔为代表的时代英雄们剥夺了。

2. 卖榛子：钱广与雷锋

按照务实派周队长的看法，钱广给社员往外捎卖山货对个人对集体都有好处。个人多闹了两钱儿，队里也多了一个劳力。张万山提出的卖给供销社的办法，意味着少闹两（俩）钱儿。这在现实生活中是下下策，社员们百般无奈才走这条路。

要往山外捎卖山货，只有求钱广。钱广可以帮，也可以不帮。但是，在影片里，钱广是来者不拒，有求必应。在大车上，爬上爬下拴牢社员的筐筐口袋，不厌其烦地停车，按理说，钱广的任务就是把车上的白梨送到收购站，卸了车，结了账，他就完事大吉。剩下的时间，他可以逛逛街，听听戏，跟镇上熟人朋友侃侃山，喝两口；或者像某些车倌那样，到相好的家里美美地吃一顿，爽爽地睡一觉。可是，钱广却没有这份闲心，他要完成社员的托付，为给他们多闹两（俩）钱儿而操劳。

你看他，到了收购站，先要爬上车顶，把那些装着辣椒、蘑菇、榛子的口袋筐筐从车上卸下来，然后才能卸白梨。等公家的事了结，他才能把车赶到集市上去。到了集上，先把车马拴好，再拎着抱着背着那些山货里找个空地，摆个小摊，蹲着摆货，站着吆喝，为这些山货能卖个好价钱，左等右等，讨价还价。回到村里，他又把卖山货所得，一分不差地交给托他的社员。长年累月地不惮辛劳，无偿地为社员为集体服务，这是什么精神？如果把戴在钱广头上的政治帽子摘下去，他离雷锋有多远？

钱广做好事，与供销社收购价低有直接关系。供销社的收购价是统购统销的产物。统购统销是国家控制农产品，榨取农业的剩余的恶政苛法。它用低于市场的价格将农副产品收到国家手里，通过盘剥农民，进行工业化。

从这个意义上讲，钱广是在帮助青松岭的同胞维权，维护他们的“局部退出权”，维护他们的市场定价权。通过维护这两种权利，稳定了青松岭的人心，保证了秋收大忙的出工率。他赶的大车，走向资本主义的路，是走对了。如果按今天的标准，钱广就是维权的英雄，维稳的典范。那么，我们应该怎么评价那位执意夺回他的鞭杆子的万山大叔呢？

3. 艺术作品的生命力

在文革电影中,《青松岭》的生命力较为长久。¹这个生命力来自三个方面:

第一,有强烈且持久的戏剧悬念——那马一到红石口就受惊。这个悬念贯穿全剧,直到结尾。使之有了惊险片的特点,这是此片的魅力之一。

第二,选景、置景上下了大本钱。摄制组跑了河北多处山区,初选青龙,后定兴隆。因为后者环境优美“紧靠灵山,山形挺拔,绿茵覆盖其上,清泉环绕其间。”为了拍戏,专门“在选定的村子里圈了两三亩地,早早将美工派出,专门搭了一条街道,给张万山和钱广各盖了一所带有宽敞院了(落)的红色两大间砖房,还搭了一个广场”,戏里需要大量白梨,从外地买来白梨和树枝,在地上打上木桩,往树上拴白梨,往梨上喷水,以显鲜亮。²景是戏的物质条件,是视觉艺术的基础。此片之所以成为“唯一一部胜过原片的重拍片”,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原片在选景、置景上没有下这么大的本钱。

第三,在摄影方面下了大功夫。此片从多种角度呈现了山水之美,可以剪辑成一部旅游风光片。此片在用光线和色调来褒我贬敌方面费了很多心思:“张家房子宽阔,玻璃窗一大排,阳光充足,调子温暖,向日葵、朝天椒(、)杈(枝)繁叶茂的梨树,生气盎然,充满了纵深感;钱家阴暗低沉,调子灰冷,门楼上的南瓜秧瘦叶黄,奄奄一息。张万山教秀梅赶车正当清晨,盘山道上朝阳普照,清新明快;而钱广赶车回来恰值黄昏,盘山道上阴暗窄堵,日暮途穷……”而在塑造人物上,此片更用了心血:“在夺鞭重场戏中,当周成在高台上喊‘撤了钱广谁来赶车’时,张万山冲上前去夺下鞭子大喊一声‘我’!接着用变焦镜头迅速拉成大全景,又用了三个连续跳进的镜头全——近——物,最后镜头落在张万山炯

¹ 翟建农在《红色往事:1966—1976年的中国电影》一书中谈到:“《青松岭》生命力之长久令人咋舌,时至今日,拍过许多影片的姜树森在参加社会活动时,只要一说是《青松岭》的导演,会场常常一片喊‘哇’声。”见223页,北京,台海出版社,2001年。

² 翟建农:《红色往事:1966—1976年的中国电影》页219—220,北京,台海出版社,2001年。

炯发光的眼神上，气势不凡。”¹江青是用光设调方面的内行。于会泳称赞此片，既是因为此片的摄影深得江青之心，也是因为原片在这方面没有下功夫。

最后说说李仁堂的表演。尽管激进派仍旧对张万山这个形象有意见，认为“张万山作为主要英雄人物不够突出，同时，张万山这个人物，朴素的阶级感情超过路线斗争觉悟，作为一个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捍卫者来要求，形象还不够高大。”²但是，这不妨碍李仁堂一炮走红。这说明大众审美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对于那些相信关于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说教，习惯于那个时代无处不在的豪言壮语的大众来说，张万山的形象是完整的、高大的。他那不食人间烟火的偏执，那标语口号式的“假大空”，在习以为常的欣赏心理中被忽略，他那可亲可敬的老农本色，在脱离生活的新作品的比较下，被放大被强化，成为新时代的稀缺，而长驻人心。

毛时代的大多数文艺作品，都是以塑造英雄人物为己任的。这些英雄都是矛盾结合体，一方面，他们是旧意识形态的忠实信仰者和积极践行者，另一方面，他们又集各种优秀质量（品质）于一身。一方面，他们是令人憎恶的“假大空”的代表，另一方面，他们身上又有亲切感人的乡土气和草根性。道德之光遮闭了思想之恶。细节之真，掩盖了言说之假。

张万山就是这样一个矛盾体。他反对社员多闹两（俩）钱儿，似乎是一个无视乡亲疾苦的极左分子。但在紧要关头，他又置生死于度外，扑上去拦住惊马。他觉悟奇高，神经过敏，完全是一个阶级斗争妄想狂，但他又关心集体，舍己忘家，为治好病马而昼夜操劳，为培养青年而竭尽全力。有时候，他会说出那些令人厌恶的豪言壮语：“为了保卫社会主义江山，为了所有受苦的人们都过上好日子，我这把老骨头就是早几天入土又有啥舍不得！”但一回到生活中，无论是编筐、喂马、赶车，还是摆弄旱烟袋，他又成了一个地道的、朴实的，令人亲近的老农。■

¹ 翟建农：《红色往事：1966—1976年的中国电影》页220—221，北京，台海出版社，2001年。

² 宿燕：《咱不掌鞭谁掌鞭——评彩色故事片〈青松岭〉》1974年2月9日《人民日报》。

【述 往】

文革中在顺义的“八年抗战”（上）

王 理

我是在1967年12月11日来到北京顺义县的一所初级中学报到的，在这所落后闭塞的农村学校里度过了与中国抗日战争完全等长的八年岁月（我于1976年1月19日调离该校）。

—

先简单回顾一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顺义县的概貌。

顺义县城也叫仁和镇，镇中心相当于建立在一个大土包上，土包的顶端是一个十字路口，该十字路口又称石幢，从十字路口中心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延伸下去的四条街都是明显的下坡路。这个十字路口把仁和镇分为4部分，东北部分叫复兴村，西北部分叫太平村，西南部分叫前进村，东南部分叫胜利村。如果把这个十字路口作为坐标中心，从该中心出发往东去的东街不足100米长，下面便是一个农贸市场；西街下坡约200米再下穿过京承铁路的一个桥洞后便是顺义县长途汽车站广场；北街下坡约150米后紧接着就是一个大上坡，坡上并排着门口朝南的县委、县政府、法院、公安局等单位，它们都背靠着顺义县城的北城墙；南街约150米，沿南街再往南约1里地又是一个大一些的十字路口，东西方向是从北京过来通往平谷县的公路，正南方向的路直通通县，从该路口再往南最多2里地就是我所在的那所初级中学。

再回到仁和镇的十字路口。把着路口东北角是一座顺义县最“大”的饭馆，几条桌椅板凳全掉了漆，黑乎乎脏兮兮让人难以下坐，它的后身往北一点还有一个更脏更小的回民饭馆。路口西北角是个卖副食品的商店，西南角是个糕点食品店，东南角是个修理店。东街路南有该镇唯一的一个卖菜卖肉的店铺，南街路西有一个小百货商店和一个小浴室。在南边那个大十字路口的西北角还有一个副食商店，西南角是一个新华书店，书店往南不远

是顺义县唯一的一个邮电局。以上差不多就是顺义县的全部商业设施。

二

我所在的这所初级中学是在顺义县还隶属于河北省时的 1956 年建校的,由于它离开县城中心只有三四里地,故名为顺义县城关中学。此前顺义县已经有了两所完全中学,其中一所就是在县城正北 25 里远的牛栏山中学(现在叫牛栏山一中)。文革前北京市只有 10 所市属重点中学,牛栏山中学是唯一一所地处远郊区、县的市属重点中学,如今颇具盛名的人大附中、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等市属重点中学当时还都不在市属重点之列。由于有牛栏山中学罩着,使得这所初级中学的生源和师资力量都相对弱得多。

自从 1958 年顺义县划归北京市后,才陆续有北京市属师范院校的毕业生被分来,教师队伍中才开始有了大专学历甚至本科学历的教师,之前的教师多只有中师甚至初师的学历。

别看学校很差,由于它的地理位置的优势——步行到可以直通北京东直门的顺义长途汽车站最多只需 20 分钟——所以由北京市内分配到顺义县的大专院校毕业生们,都宁愿把自己分配在这所小学校工作,而不愿意去名气大、条件好的牛栏山中学。同理,家在北京市内、人在顺义县各地的教师在调回北京市内无望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都愿意调来这所小学校,唯一的理由就是从这里乘长途汽车回北京,比顺义任何其他地方都要方便得多。

我作为一个外乡人,其实并不十分在意地理位置这一点,我主要在意的是工作性质。在分配到顺义之前和之后,我都没有停止过为离开中小学教育局系统而努力奔走。比如,我曾独自闯进冶金部大楼(在王府井北边)的人事部门,毛遂自荐可以到冶金部所属的全国任何地方的工厂或科研单位工作。接待我的一位女工作人员告诉我,在离开甘肃兰州一百多公里的一个山沟沟里有一个冶金部下属的工厂,需要学数学的人来做计算工作。我当即表示非常愿意前往,但是她说前提是你们单位必须同意放你走,我们才可发调函。“单位同意放人”这在当年对普通百姓来说,那就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障碍。尽管如此,当我把这个信息告诉一起分配到北京市教育局的同学们时,大家都很振奋,有的同学甚至高兴得

手舞足蹈，就好像马上可以调成似的，可见在当时的背景下，同学们离开教育系统的心情有多么急切，也可见不是我一个人持有这种思想观念。

然而这种思想观念的形成实际上是时代的产物，并非与生俱来的。在毛泽东倡导极左的年代里，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被一贬再贬，像中小学教师这种小知识分子的地位更是低到了不能再低的程度。举例来说：一位生产大队的书记对他管辖下的一位小学教师许诺保证：“你好好干，将来我一定提拔你当咱们供销社的售货员！”

上面已经说了顺义县城关中学的师资力量较弱的情况，再来看看该校的学生来源情况。

由于地处农村，学生绝大部分都是周边农村的孩子，离学校最远的村庄是杨家营和吴家营，距学校足有15里地，孩子们若不自带午饭，每天上学来回两趟要跑60多里路。这些农业户口的学生可以占到学生总数的70%以上。剩下不足30%的非农业户口学生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县属机关工作人员和工厂家属的子女，另一部分就是学校旁边的一个北京卫戍区部队师级营房的军人子女。

当时的农村在毛泽东的“以粮为纲”等错误农业政策的威逼下，生产队只准许种植粮食作物，社员私自搞任何副业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行为，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这种资本主义的“尾巴”是必须要割除掉的。所以一般农村家庭除了卖鸡蛋、卖私养猪（一个家庭一年最多能有一口猪出圈）给国营供销社换来一点现钱外，就再也难有现钱到手了。有壮劳动力的家庭到年底结算时，全家男女老少一年挣得的工分能抵除全年家庭的口粮钱就算不错，难得分到现钱。那些缺乏壮劳力的家庭年底结算时，不仅分不到钱反而欠生产队的钱，就这样年复一年地欠着，直到孩子长大成一个劳力后，再慢慢还账。

由于农民手中缺钱，使得农业户的学生不分男女几乎人人都穿质地差的黑色土布衣服，所以农业户学生被统称为“黑衣帮”。县机关和工人的子女可以穿上质地好一些的蓝色“洋布”衣服，所以称他们为“蓝衣帮”。部队的子女多穿父母亲淘汰下来的旧军装，所以这部分学生就被称为“黄衣帮”。你只要看一下学生的衣服着装，便可以大概知道他的家庭背景了。

三

最多一百米见方的校园紧靠着从顺义县通往通县的公路，其它三边都紧挨着空旷的农田，四周没有住家毗邻，自然是没有围墙的了。校舍主体是平房，学校正中央的三排平房每排10间，每间约8平方米。南边一排全为教职工宿舍，每间两人。中间一排除了两间教师宿舍外，其余为教师办公室，北边一排是领导办公室、储物室等。这三排平房的东边还有三排平房全是学生教室，每排四间共12间教室。校舍最北边还有一座二层小“楼”，楼上楼下各4间教室，楼梯是木质结构，学生上下课跑得楼梯震天响。

另外，学校最西北角紧挨着公路还有4间孤零零的宿舍和教工的伙房。我在其中的一间宿舍住过几年，睡到半夜经常有路过的大型货车司机来敲门问路：“喂！同志！到通县去的路走哪一条？”因为旁边还有一条与到通县的路一样宽窄的路，从宿舍门口前分叉，那条路的终点是一座四周被田野环抱着的孤立的县农机厂。我一直神经衰弱入睡困难，被叫醒后丧气之极，还不得不回答司机的问题，否则他就继续不断问下去。

当然，作为农村的一所初级中学，这个规模也不算太小了。

以上说了这么多是为了让思绪尽量回到那个时代，因为现在的顺义则是完全没有了那时的一点儿影子。一次我路过顺义时，不由自主地想看看那所曾经让我把性命都差点儿丢在那里的学校，可居然找不到了，后询问了过路人才找到，改名为顺义区第一中学。

然而，当时顺义县的闭塞落后和愚昧狭隘主要并不表现在这些落后的“硬件设施”上，而是表现在人的思想意识层面。我先讲一个真实的笑话作为铺垫。

可能在1969年，顺义南边的那个大一些的十字路口安了一个交通信号灯，这无疑是顺义县有史以来第一个现代化的交通安全管制设施。有一天我到县城里去干什么事，走到路口时，正好碰上一个交通事故。从北往南开过来一辆手扶拖拉机，与从西向东的一辆马车相撞了。马车前边的一头拉辕骡子被撞得满嘴流血，车把式怒气冲天拽着拖拉机手的衣领子论理。拖拉机手辩解到：“你没看见你那边是红灯吗？你不拽住牲口停车，我怎么来得

及刹车？”车把式理直气壮地反问：“红灯怎么了？红灯就许你走不许我走？你们家的规矩？”

四

从顺义县长途汽车站到北京市东直门的距离正好是30公里，这可以从公路边上竖立着记录里程的小石碑上的里程数一目了然。令人惊叹的是，就这么30公里的距离就可以使北京与顺义恍若两个天地！这是我到顺义县之前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事情。我感到当时顺义的社会状态简直就像离开北京3000公里以外“山高皇帝远”的一个落后村庄。

与我同时分配来的共4位1965届毕业生，一两个月后又分来2位，再加上早我们一两个月从北京市教育局直接分配来的1位山东师院1966届毕业生共7位新分配来的教师，其中1位女生是三年制大专毕业，其他6位男生均本科毕业。

此时文化革命乱哄哄闹了一年多了，刚刚开始“复课闹革命”不久，对一个只有36位任课教师的农村初级中学来说，突然从北京一下分配来这么多“洋学生”，也算是一个不小的变化了。学生们觉得新奇，多流露出好奇的目光。教师们虽矜持一些，但由于我们没有参加过他们在文革中的两派斗争，所以他们似乎都对我们热情有加，希望我们支持自己这一派，亲切地称我们为“新老师”，称呼了好几年，直到1970年又分配来几位文革中毕业、在部队农场劳动锻炼结束的红卫兵大学生后，才结束了这个亲切的称呼。

和全国各地各单位一样，全校教职工也分成造反派和保守派，虽然表面上联合起来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实际上两派的思想隔阂还是很深的。令我感到十分诧异的是，这两派群众各自的行为做派和思想意识有着截然相反的特点：“造反派”的几个头面人物都比较老实厚道为人正派，能力相对弱一些，处于受欺负受指责的被动地位，那些“出身不好”的教师几乎都是“造反派”；反之保守派的几个骨干人物显得十分嚣张，不仅占着“出身好”的优势，而且头脑狡黠，巧舌如簧，对当了革委会副主任的两个造反派头头时时发难，这当然不排除革委会主任是支持保守派的所谓“结合干部”的原因。后者的代表人物是被

称为“文霸”的 BXL 和“武霸”的 LGD。（为了尊重他们的人格还是不点名吧！）

这个“文霸”凭借自己贫农出身又是中共党员的身份对“出身不好”的对立派或中间派老师俨然摆出一副高高在上、趾高气昂、不可一世、咄咄逼人的姿态，专以整人为嗜好，明显可以看得出许多教师挺怕他的。仅举一例，一位音乐老师，出身可能是资本家，她是中国音乐学院毕业的高材生，毕业时老师想要她留校，由于出身不好最后没留成。她是一个很不错的女高音，钢琴弹得好，人也长得俊秀。此人平日为人宽容大度，颇有大家闺秀的风范，在教职工中威信很好。文革一开始，“文霸”鼓动年幼无知的学生对这位音乐老师进行侮辱人格性的批斗，声称贫下中农子女就是要批斗资产阶级小姐作风。批斗的时间虽不长，但对这位老师此后的人生轨迹造成了难以弥补的重大影响。

那个“武霸”自我吹嘘“出身工农干”，即出身工人加革命干部（他觉得只说工人或革命干部一项还不够来劲儿！），依仗着与革委会主任（女性）的特殊关系为人霸气十足，走路摇头晃脑，不把一般人放在眼里，尤其对一个有一点精神病态的教师时有大打出手。

面对这种明显不公正不合常理的状态，我们几个“新老师”都是刚步入社会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正好我们7个人中有6个的家庭出身，是当时那个年代最时兴的所谓“根正苗红”的“红五类”，自然不会屈服于痞子气十足的“地头蛇”。我当时不可能意识到，我好打抱不平的毛病，为日后党组织把我内定为“裴多菲反革命俱乐部的头子”埋下了伏笔。

五

那时学校的日常运作状态是现在的人难以想象的。

学校的职能本来应该是教书育人，可那时的学校已经不再把“教书”当回事儿了，那是因为“读书无用论”已经成了客观存在的事实，它逐渐程度不同地扎根在人们的信念中，尽管在大会小会上不断批判“读书无用论”，甚至采用大字报形式搞群众运动式的批判，其结果只能是走走过场收效甚微，无奈“存在决定意识”的客观规律谁也违背不了。

眼前的事实是读书读得再好毕业后也是插队当农民，书读得不好只要走关系能入伍当

兵便可以前程似锦，若入伍后再能入党提干，那更是一部登天，远远胜过读书上大学最终落个臭老九的下场。尤其对农村的孩子来说，当了兵家庭就是军属，生产队还给军属一定的照顾，这简直就是“鲤鱼跳龙门”，年轻学生怎么可能不趋之若鹜。

多数学生不愿意或不重视课堂上书本知识的学习，那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了，学生在课堂上说话聊天甚至吵嘴打架，那是家常便饭，有的课堂上热闹得简直就像茶馆一样。老师想正常授课也根本无法进行，只能在课上把调解学生之间的纠纷，并想方设法维持好课堂纪律作为课堂上的首要任务。在领导眼里衡量一个教师本事大小的标准，也主要是看在他的课上学生课堂纪律的好坏。至于讲什么内容、讲多少、讲到什么程度自然而然就变得无关紧要了，对于课程教学几乎没有任何要求。

面对这样的学风和校风，教师实际上用不着备课，也没人检查，所以我实在记不起来我什么时候认真写过教案之类的东西。我倒是清楚地记得有一年“五一”节过后，为了紧跟形势，我教的政治课马上改讲人民日报的“五一社论”，一直讲到九月中下旬开始放“大秋假”。其实哪有那么多可讲的内容！纯粹是糊弄学生，想来真是惭愧，纯属误人子弟呀！

这里要解释一下“大秋假”。农村学校一年要放三个假：寒假放一个月左右（与城市学校相同），另一个假期叫“农忙假”又叫“夏收假”放两个星期多一些，在7月中上旬（因为收割麦子的时间短而急），时间最长的是“大秋假”又叫“秋收假”，长达四五十天（因为北方农村秋收时间很长），从9月中下旬开始。

至于学校的“育人”职能也只是停留在空头的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上。“四人帮”为了贯彻无产阶级教育方针的“最高指示”，鼓吹“读书越多越反动”，所以人们的头脑中，把学生在学校应该学什么做什么也完全政治化了。举例来说，根据“最高指示”学生在学校必须要“学工”、“学农”、“学军”，只有这样学校才能培养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合格的接班人”。为了落实“最高指示”每年都要安排一定的时间让学生到工厂与工人师傅一起劳动，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还要经常安排学生到学校自己建立的学农基地，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此外还要组织非农业户的学生在假期中到附近生产队劳动，与社员实行

“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农业户口的学生在假期里自然是在自己家所在的生产队劳动挣工分。至于“学军”就是请旁边部队营房的战士来学校定期对学生进行军事科目的操练。

最高领袖自己也是说到做到身体力行，林彪事件之后很快就把做过工人、农民、军人这三种职业的王洪文（上海某纺织厂的一个保卫干事）提拔为他的接班人，地位排在老师叶剑英的前边，成为包括学生在内的全中国年轻人敬仰学习的楷模。

六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我在城关中学的头两三年（1968——1970）其实挺受重视的，可以说是“风调雨顺”。其原因很简单：一是我新来乍到，没有介入过学校内的两派斗争，哪一派群众与我也没有过往芥蒂，容易获得群众的一致认可；二是我“出身好”，无论校领导还是进驻学校的工农兵宣传队都可以放心使用，不至于落下“阶级路线不清、用人失察”的把柄。

进入1968年以后，全国性的大规模的两派武斗基本结束，全国各地各单位陆续成立了新生的革命政权——革命委员会。革委会的领导班子一般由被解放了的“革命干部”或“支左”（支持左派的简称）解放军代表领头，还有两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共同组成。有了新的政权形式之后，文革以来各单位那种没有权威的混乱状态宣告结束。接踵而来的便是全国性的轰轰烈烈的“清队”（清理阶级队伍）与“整党”运动。

“清队”的办法与以往的“镇反”、“肃反”等运动并无二致，无非是内查外调深挖历史问题，新帐旧账一起算。用当时中央公布的所谓“公安六条”作为标准来界定“历史反革命”（敌我矛盾）和“一般历史问题”（人民内部矛盾）。对划归敌我矛盾的人要实行“群专”，即无产阶级的群众专政，把这些人集中起来住在一起，剥夺人身自由，由专人负责看管，接受大会小会的批判，批判时必“坐喷气式飞机”（两个人摁着被批判者的头，使其低头弯腰并把胳膊从背后向上抬起），从始至终不断高呼打倒某某某的口号声，

会场气氛恐怖，极具震慑力。

“整党”则与以往的整风运动有两个很大的不同点。

其一，这次“整党”主要任务有两项：一是党员要逐个通过审查，通过群众大会的群众评议，没有重大问题的恢复组织生活，有重大问题的党员不能恢复党籍，当然也就不能恢复组织生活；另一个是要“吐故纳新”，文革中坚定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表现好的群众要吸收入党，称之为“纳新”，那些不能恢复组织生活的党员自然就是被“吐故”了。

其二，“整党”领导小组的成员不再是过去那样，由党的领导干部直接负责。事实上自从文革以来，各级党组织全被打倒了，过去的党的领导班子已经不存在了。现在要重新建立新的领导班子，等于要重打锣鼓另开张，所以“整党”领导小组的人选只能由进驻学校的工农兵宣传队决定，再报请上一级宣传队批准。

与以往最不同的是这个“整党”领导小组中必须要有一个非党员群众作为群众代表加进来。这等于说，让一个非党员群众参与决定哪个党员够资格可以继续留在党内，而哪个党员不合格应该被“吐故”。工农兵宣传队征求了各方面意见后，决定让我作为群众代表进入“整党”领导小组。

这一决定实在让我吃惊不小，而更多的则是担心，因为我从北大到市教育局一直是被划入另册、有专人负责暗中监视并要向组织汇报的对象，个中缘由我很清楚是由于在大学阶段我的档案里装进去了很多莫须有的“黑材料”。如今落魄到一所农村小学校里，我只求默默无闻相安无事，从未有过想入党做官、走仕途之路、出人头的非分之想。所以宣传队对我的这个“重用”反而使我内心惴惴不安，表面上我不动声色，但我心里我估计工农兵宣传队他们肯定没有去查看过我的档案，才贸然做出这个决定。可我又不敢“狗坐轿子不识抬举”，只能硬着头皮干吧。

在“清队”、“整党”这一阶段，宣传队和革委会都很器重我，双方各有不止一人，分别私下低声细语且语气急迫地鼓动我：“老王！快写呀！你怎么还不写呀？”我当然心照不宣地知道他们所说的“写”是指写入党申请书，给我的印象好像他们双方一起讨论过

“纳新”的主要对象应该是我。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我的苦衷。首先一点，正如我前边所说的，我一直以来对入党没有什么兴趣，尽管我很清楚地知道在当时那个年代，党员的名号对一个人的一生那可是非常重要的本钱；其次，我认为我的档案里被塞进去的“东西”是永远伴随我一生的一颗“定时炸弹”，如果我写了入党申请书，无疑等于自己主动引爆这颗炸弹；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的父亲从文革一开始就作为“黑帮”被专政隔离了起来，不断地检查、交代、挨批斗，直到1970年去世都没有恢复组织生活。全学校上下现在谁也不知道我的这个家庭情况，人家当然还承认我是“红五类”，但只要往父亲单位发一封函调，就可以揭穿我的老底而变成“黑五类”。

所以我不能没事找事，这就是我当时的真实思想。

不过，话再说回来，我也听一些深谙世事的人说过：党要想让你入党，什么样的情况都可以入；要不想让你入，你的条件再好、再积极表现也没用。我到现在也不清楚当时组织动员我写入党申请书而我没敢写，究竟是对还是不对，所以前半句话我无法验证。然而后半句话，我的亲身经历完全验证了它的正确性，这一点我后面再细说。

七

从我到这个学校的第一天起，我就开始思考着我将来如何离开这里，我心中的这个秘密当然是不能随便告诉他人的，因为这种思想在当年被认为是不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是大逆不道的。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还要服从分配来这个学校报到？这实在是事出有因，一言难尽。但是其中有一个原因可以很容易地说明白，那就是我当时的女朋友她很高兴来这个学校报到，因为她知道把她分配来这个学校已经是对她极大的“优待”了，因为若不是与我的关系她原本是要被分配去密云山区的，由于我的抗争，市教育局采取了一个息事宁人的折中方案，把我们两人一起分配到这所学校。

要想调离这所学校，必须要有理由，在那个年代最过硬的理由是夫妻两地分居，或者

是家庭中有长期病号离不开本人的照顾，对我来说这两条理由都不存在。我只能以专业不对口作为我的理由，然而我心里也知道这个理由在当时那个年代是比较勉强的。

自从文革以来，我一直坚信“文化大革命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及时的”，文革以前的那种黑暗的“铁幕”体制必须彻底摧毁。由于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非常复杂，致使知识与知识分子暂时不受重视甚至受到歧视，这肯定不会长久的，一旦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重视知识、重视科学、重视知识分子的那一天迟早会到来的，只是个时间问题。

我既要耐心等待，也要未雨绸缪着眼未来，否则到时候就会措手不及，所以我不能荒废自己仅有的一点专业特长。再加上校领导和宣传队对我的器重，使我感到没有了在北大和市教育局那些年强加在我身上的政治压力，所以一有时间我就看书。记得那时我最常看的书有两类：一类是俄文版的科普书籍，怕荒废了俄语；另一类是英文版的数学专业书，比如一位哈佛大学的教授写的《Abstract Algebra》，还有从王府井外文书店买回来几十本影印的《Algebra》等数学期刊。

起初看这些书我都是偷偷摸摸，比如节假日老师们都回家了，不会被人发现就不会招来“不安心党的教育事业”的非议。

有一次星期日我正在看书，一位平日与我关系不错的领导突然推门进来，看见了我在看书，没说什么就坐在我的床上与我聊起了家常，没批评我。事后我非常担心，我担心这位领导如果把我看外文书的事儿告诉了其他领导和驻校宣传队的话，他们会警觉起来：你这个王理！我们想让你入党你却不写入党申请书，一有空儿却看那些毫无用处的外文书，这不就是不求政治上进的白专道路吗？

但过了好一阵子，我一直没发现有什么异常，这使我的胆子大了起来，不是节假日我也敢在晚上看书了。再后来我发现这里的人对我看一些与中学教育毫无关系的专业书，只觉得好奇而并无非议，甚至可能还相反。

我猜想大概是他们觉得这仅仅是我本人的一种癖好，与他们自己的政治利害关系以及

物质利益的得失没有关系。从而这使我体会到了城乡之间在思想观念方面确实存在着我原先完全意想不到的巨大差异。

八

从我进校的第一天起，我就只想平平淡淡默默无闻，不愿意抛头露面，最好是大家都把我遗忘了才好，期盼有朝一日出现一个合适的机会，使我可以顺利地离开顺义这块地方。现在事与愿违把我推到了一个众目睽睽的“群众代表”的地位，我的一言一行在两派群众的眼里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所以我必须谨言慎行，既要坚守正义又不能过分得罪“地方主义”色彩浓厚的这些人。

在“清队整党”这一阶段，作为“群众代表”我做过三次经过深思熟虑后的重要表态，应该说基本上还是获得了大家的首肯。

先说第一次。当时学校的气氛被阶级斗争搞得已经相当紧张了，“群专”起来6个人，就在这个当口，发生了一件现在看来十分好笑的“现行反革命”事件：有一位教师把4本《毛泽东选集》垫在床板下面被人举报了。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的教师结婚多年孩子都挺大了依然没有住房的情况很普遍。一到礼拜六晚上，夫妻二人只能在一方的集体宿舍里团聚，集体宿舍里其他人主动自觉地到另外的集体宿舍过夜。集体宿舍里都是单人床，这位老师找了两个方凳和一条木板以增加单人床的宽度，为了使架在前后两个方凳上的木板与单人床一样高，他就把4本“毛选”垫在木板下，前后各两本。

这种对伟大领袖“大不敬”的行为，在当时那个年代可真是不得了的现行反革命罪行。举一个例子：1976年底，我已经调到北京工业大学，宁夏地质队请我去给他们推广计算机算法语言，他们告诉我他们单位的一个归国华侨，在1969年“九大”召开前夕，正是林彪红得发紫的时候写了一条“反动标语”：“让常胜将军见鬼去吧！”但是并没有点名道姓常胜将军指的是谁。通过查对笔迹找到他后，他承认了是指林彪。结果不出10天就把这个

华侨给枪毙了。

这位把“红宝书”居然敢用来垫床板的老师立刻就被隔离“专政”了起来。白天没完没了写检查挨批斗自不必说，半夜在睡梦中常有大声嚎叫的异常表现，可见在隔离阶段他的精神受到了极大刺激，人都快要崩溃了！

批斗了一段时间以后，宣传队和领导决定开群众大会讨论并给他定性。这位老师平日人缘不是太好，与他同一派的人不敢首先站出来替他说情，怕被扣上同情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把自己牵扯进去划不来。对立派的人更不愿意为他说情，可若要主张给他定性为敌我矛盾，又怕被人指责为挟嫌报复，这样会场上便出现了沉默的状况。

我看明白了人们的心思，我就第一个发言了。我首先严厉批判了一顿他的“犯罪”行为，最后才简短地指出：为了挽救他并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还是给他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比较有利于争取他。我的话一出，他那一派的人一个接一个抢着说：我同意王理的意见，先给他定个人民内部矛盾吧！不过对他这号人就应该好好批斗一下他，他要在旧社会那肯定就是一个典型的地痞流氓！云云。

会后不久这位老师就被“解放”了，再见到我时脸上流露出非常感激的笑容，此后一直与我保持着平和友善的关系。而对立派的老师多比较善良，觉得批斗一顿足够他接受教训了，并没有对我第一个表态给他说情产生不满。

九

在“清队整党”后期，我的第二次表态也值得一提，那是因为当时我所面对的人和事，与我大学毕业前夕所经历的那场严酷的“清理思想”运动是一脉相承的。

有一位教化学的C老师，他是1964年7月从北京师范学院化学系毕业，毕业前夕正赶上北京市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开展大规模的“清理思想”运动。这场运动原本是1963年7月毛泽东亲自批示给北京市委，要他们首先在北京市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范围内试点执行，然后再推广到全国。由于可能是当年时间来不及了，未能大规模的全面铺开，只能等下一

年即 1964 年再彻底全面地贯彻执行,因此北京市委以及所属高教系统就有了足够充裕的时间,做足了充分的准备对高校毕业生大干一场。

这位 C 老师在大学读书期间是班上的尖子生,据他的同班同学说,同学们在学习中碰到不明白的问题宁可问他也不愿意请教老师,因为他讲得比老师还清楚。但是他的家庭背景“问题”严重,所以在毕业前夕的“清理思想”运动中就成了重点对象,在高压下坦白交代了很多立场性的严重问题,并在他的档案中记录在案。

在“清队整党”阶段,他可能是出于对严酷的阶级斗争形势的畏惧,主动用大字报形式再次坦白交代了在毕业前夕“清理思想”运动中已经交代过全部问题,一下子就炸锅了,马上被“群专”了起来。在领导班子开会讨论给他的问题定性时,我作为“群众代表”发言主张应该定为人民内部矛盾。我讲了两条理由:第一,不能只看到言论的反党性质,还应该看到这些言论是在“清理思想”运动的重压下坦白交代的,他可能为了表白自己对党的诚意,难免有言过其实的成分;第二,他的言论归根结底是思想认识问题,不能完全看成立场问题,因为如果他反党立场坚定,他就不可能如此主动的向组织全盘交代,何况这两次都是他自己主动交代出来的。

我之所以旗帜鲜明地主张给他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亲身经历了那场严酷的“清理思想”运动,我知道那场运动给每个挨了批判的毕业生所做的政治结论都不是实事求是的。

我亲历这场运动的时间是从 1965 年 1 月至 1965 年 4 月底(这个时间段毕业叫做“1964 年度寒假毕业”,与“1964 年度暑假毕业”即通常于 7 月毕业属于同一年度,所以北京市委依然沿用着同样的“清理思想”运动模式),长达三个多月“清理思想”运动,通过人人过关,再揪出“反动学生”大肆批判,最后给每个人做了严厉的毕业鉴定后才毕业离校的。

然而我这一次的辩护没有起到作用,当时还是给 C 老师定性为敌我矛盾。前边说过的那个把“毛选”压在床板下的老师获得“解放”后他还没有“解放”,好像一直被“群专”

到林彪事件出来以后，对他的精神打击非常大。据说他三十好几才找了某生产队的女书记结婚，虽然她还大他好几岁且人也显老，但这桩婚姻毕竟对他孱弱的政治背景是一增强剂。

在“清队整党”期间我的第三次表态是对学校唯一的“走资派”、原书记“变节自首”历史问题定性时的表态。我参与了外调工作，知道他被捕后写了自首书，但并没有出卖其他党员造成任何恶果，应该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但是最后还是定性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细节就不说了。■（未完待续）

【述往】

文革中我参加过的“相对论批判”

小 鹰

1968年2月间，清华两派的争斗开始白热化。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已厌倦了文革生活，尤其是那没完没了的大喇叭、大字报，口号、标语、锣鼓、游行……，每天只是无所事事地观望，着实无聊。一天，听说科学院物理所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会，便和几个同学骑车去了中关村。

在物理所的一间会议大厅里，已聚有几百人的样子。和别处一样，与会者在“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常规之后，来自湖南醴陵第二中学的物理教师周友华开始了他的报告。我只记得他讲，他是在一座古庙的门框上悬挂一个重锤，然后发现“每日早晚锤尖的位置有规律地变化”，但已记不得他是怎样由此联系到要批判相对论的问题上去的。据物理所研究员郝柏林后来回忆^[1]，“周从而得出结论说万有引力常数随温度变化，提出了一套‘热轻冷重’学说。”那天会上反对他的人发言时，就有说他的观察不过是“热胀冷缩”的现象而已。还有一位发言者“声色俱厉”地质问他，“你说‘总有一天太阳不再升起’是什

^[1]郝柏林，《一段荒诞往事：“批判爱因斯坦”》，2009。

么意思？”那时的人在政治上都高度警觉，因为“红太阳”就是专指毛主席的用语，而周在谈到日出日落时可能是用词不当或不小心的说漏了嘴，因此，会场气氛一度火爆。这种问话出自物理所书生之口，又在这种场合下，总让人感觉很不协调，甚至有点滑稽。但我明白，这大概叫做“以毒攻毒”，文革中人们常常这样互抓话柄，攻来攻去。回来后，我与几位同去的同学谈起周的观察，我认为导致那些变化的因素太多，不过，由天体运行引起“固体潮汐”的影响，可能比“热胀冷缩”更容易解释他的观察。他们赞同我的看法。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我们也不再把“相对论”一事放在心里。

但不到两个月，清华便开始了大规模的武斗，两派抢占楼宇，把学生赶走，使得在校住宿和吃饭都成了问题。此时听说科学院刚成立了“批判相对论学习班”，因为那里有熟人 W1 已在其中，我们几个同学便决定到那里去看看。

学习班的行政头头是天文台中年老成的 H，还有个副手 C，但核心人物是北航的研究生 W1。W1 的脑筋和笔头“像鬼一般地快”，在讨论时可以迅速把众人所说的集成文字，并朗朗上口。他引用奥地利物理学家玻尔兹曼(1844—1906)的一句名言：“雅致的事当留给靴匠¹和裁缝去做”(Elegance should be left to shoemakers and tailors.)，自谦自己不过是把大家的意见拼凑在一起的“总裁缝”罢了。但不久便被大家简称为“总裁”，有人还提醒道，“世界上除了蒋介石和日本自民党的首脑，如岸信介，被称为总裁之外，阁下是第三位。”

W1 的近代物理基础一般，但英文笔译飞快，数学甚好，尤精流体力学中的湍流问题。来自物理所的人有北大毕业的 W2 和清华毕业的 G，从清华去的五个人，X、Z、J、L 及我，都是工程物理系五、六年级的高班生，已上过电动力学等近代物理课程。W2、X、Z 和 G 物理概念扎实，逻辑思维清晰，后来都成了搞理论一等一的好手。S 是从计量科学院来的，从科大先后来过两三位，只有一位 Z 留了下来。还有一位 L 是党校搞哲学的，能言善辩，

¹ 这里，玻尔兹曼原来用的是“手套工匠”(Handschuhmacher)一字，在德译英时被误为“靴匠”(Shoemaker)，此后英译中亦照翻不误，流传至今。这是译界，或更一般，是信息传递中，“以讹传讹”、“人云亦云”之一例。

但盘算太多。

显然，这些年青人凑在一起，已不再是周有华的“热轻冷重”说的水平了。我们决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以往有关相对论的哲学讨论及物理实验的文献细细查考一番。毕竟爱因斯坦并未因发现“相对论”得过诺贝尔奖，可见当时物理界对他在这个领域的学术成就争议很大。于是H和C负责到图书馆去借来大量的外文期刊和书籍，分给大家去看。其中W1译得最多最快，然后轮流传阅讨论。

在思想闭塞专一的文革年代，这些西方学界的争论无疑给大家启发很大。记得W1译过一篇论文，忘了作者是谁，里面有一句话，大意是“当科学家费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登上了知识的顶峰，在那里却遇见了‘恭候以久’的一批神学家。”这句话令大家印象深刻，感叹不已，也开启了我个人对上帝的认知。多年之后，业已成名的科大Z同学皈依了佛门，他在对公众讲学时说了同样的话，但只把“神学家”改为“佛学家”。他没有提到此乃前人所言，只是改动了一个字，便成为他的“偈语”，为人广为传颂，这令我惊异。

然而，后来有人据此便把现代物理与佛学硬扯在一起，大谈“科学的终结竟是信仰的起点”。我却以为，科学与信仰不是终点和起点的关系。科学并非是要用来迎合或诠释宗教，而宗教也不应替代或约束科学。爱因斯坦讲过，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足的科学，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盲目的宗教。”上帝无需科学的证明，科学也无法证伪上帝。科学与宗教信仰，实际上是两个不同范畴的东西，它们可以并存，即使在同一个人的身上。一个严肃的科学家与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有着某种相通的地方，那就是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以及一种追求真理的热忱和勇气。在我看来，基督宗教精神实际上是人类的一种高尚信念和情感的升华，一种对于大爱、公义、圣洁、永恒和超越的追求与信心。

科学院的条件很好，以批判的名义，可以看到许多西方的资料。因为量大，我们几个学生干脆就住在那间会议室，晚上加班，白天在科学院的食堂买饭吃。一天晚上，W2的弟弟，W3，来到我们住处。W3和我同系同级，人极为聪明，是学校的尖子生。他来是因为一人在家闷得抓狂，听说这里有一帮同学，便跑来要和我们打桥牌。那时我们中间，也许只

有清华的 Z 会，于是一拍即合，W3 和 Z 便开始教我们玩。他们俩教得很正规，从谁洗牌、谁切牌、谁发牌及顺序，到如何叫牌、怎样问尖问 K、以及记分都有严格规定。Z 警告说，牌场上要是有一点差池，乱了规矩，人家就不会跟你玩了。于是我们不敢造次，一板一眼地学，很快也就上了瘾。只是记分太复杂，通常由 W3 和 Z 细细地算，一笔不苟。

到了七月，学习班写出一篇《相对论批判》的文章，准备作为“成果”上报毛主席、林副主席，以及中央文革各位。大信封都装好了，就要送走之前，学习班的负责人 H 说，再检查一遍吧！结果在给林彪的信封中，竟发现一张桥牌记分纸被夹在其中，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我们”、“你们”，每局的分数，还有些“哈哈”之类的胡话和涂鸦，H 见了差点没背过去。这除了“大不敬”之外，还因为“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以好打桥牌闻名，于是桥牌在“革命者”看来，也一定是“资产阶级”的玩艺。好在事后 H 没有不准我们再打牌，但我们从此也的确很少再玩了。

下面谈谈我们在物理方面做了些什么事。

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提出了两个基本原理，第一个是“光速不变原理”，即在所有惯性系中光速各向同性，等于常数值 c ，与座标变换无关。第二个是“狭义相对性原理”，即各惯性系物理定律相同有效，平权等价；真实的物理定律必须具有洛仑兹变换的不变性。由此他建立了一套崭新的四维时空观念，包括由洛仑兹变换引出的同时性的相对性。这是物理学、以至人类理性与思维的一个伟大的跃进，并非是单纯的经验归纳所致。

但经过讨论，我们觉得，这两个原理有些重复，显得过强。从经济的原则来看，只要肯定在一个惯性系(标准系)中，真空中单程光速各向同性，等于常数值 c ，且与光源运动无关，再加上“相对性原理”，便可得出“光速不变原理”。

在查找文献之后，我们认为在地球这个惯性系(待定系)中，实验直接验证的只是双程光速各向同性，等于常数值 c ，且与光源运动无关。这比所有惯性系中“单程光速不变”的假定，要弱一些。因此想到，如果我们退一步，暂时放弃“相对性原理”，仅从满足这个实验结果出发，看能得出什么样的线性时空变换？

部分推导的结果，可见附录，这里简要说明几句。

我们导出的待定系与标准系之间的时空变换关系，很接近相对论的洛仑兹变换，但它有一个待定因子 f 需由实验进一步决定。如果 $f = \beta = v/c$ ，就是洛仑兹变换。在地球系中，可以认为， $f \sim \beta = v/c \ll 1$ ，即与 β 同数量级。

标准系的时空度规张量与相对论一致，表明它是正交的闵欧氏空间，光速各向同性。但在待定惯性系中，如果待定因子 $f \neq \beta$ ，度规将不是正交的，对光的传播而言，群速度各向异性。换言之，光速可能在一个方向上大于 c ，在反方向上则小于 c ，但可以证明双程光速的确是 invariant 的。

在狭义相对论的情形，协变张量 $g_{\mu\nu}$ 与逆变张量 $g^{\mu\nu}$ 没有区别，但是对于非正交变换，四度矢量及张量有协变与逆变之分；此外，要看出由于引入待定因子 f 所带来的差异，计算往往要展开到高阶项，因而数学推证繁复。无论如何，我们终于把电动力学及场论里所有的重要关系，用这个新的观点又重新推导了一番。

最后的结论是，由于 f 与 β 同数量级，在目前的实验精度范围内，用这个带 f 的洛仑兹变换，同样可以解释所有已知验证狭义相对论的实验，包括运动的时钟变慢，尺度变短等狭义相对论效应。然而，不同之处在于，由它推导出来的动静质量关系式，由于这个 f 因子的存在，在某些坐标系中，当粒子速度达到或超过光速时，粒子质量不会变成无限大，因而不存在对于光速不可超越的限制。

以上这些是我根据当年存留的一份资料回忆而写。

关于哲学部分的“批判”，因无资料，已记不准确我们都说了些什么。不过，那时所谓的哲学批判，多为概念生搬硬套、戴帽上纲，这都是文革时的风气，实不足为训，当引以为戒。但是，总的印象是我们强调物质的相互作用及时空的物质性。的确，没有相互作用，物质的存在便没有意义，而没有物质的存在，时空也就没有意义。因此，宇宙或时空就是相互作用着的物质存在之总和。这听起来很乏味，是不是？刚好，最近有一位对佛学感兴趣的朋友问起：“万物皆空，那物质究竟是否存在？”我答道：“‘万物皆空’是佛

教宣扬的一种处世心态，千万不要把它与真实世界混为一谈。‘古代一个哲学家反驳唯心论，他说，你要是怀疑这碗麦饭的物质是否存在，那最好请你喫下去，看饱不饱。’（鲁迅，《智识过剩》）；或者，你要是怀疑一堵墙壁的空间占有性及其相互作用，那就请‘去墙数尺，奔而入’，看你是否能‘缘起性空’、俯首捏诀而过，还是会‘头触硬壁，蓦然而踣’，以至‘额上墳起，如巨卵焉’？（蒲松龄，《崂山道士》）”

然而，这里最奇妙的却是，物质结构及其相互作用的规律又是可以被认识的，其中的一些甚至可以用数学形式准确地表达、计算和预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神迹”。那时我们在文献中读到过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宇宙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它竟然是可以思议的。”这话给了我极大的启示，敬畏之心“油然而生”。

从上述工作来看，我们那时并非是要推翻狭义相对论，而只是想要看看现有的实验能够容忍理论后退或扩大到什么地步。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显然是近代物理学的基础之一，它的对称与简洁堪称之为美丽或优雅，这对物理学家而言有着永恒的魅力。我们所做的推演，似乎把绝对时空或以太(Ether)又带了回来，破坏了那完美的四维时空对称性，尽管很微小。但从另一方面来考虑，这会不会只是一种四维时空对称性的破缺(Symmetry Breaking)？会不会因此而为实体粒子超光速运动保留一席之地？会不会与“暗物质”、“暗能量”及“宇宙膨胀”等新发现有什么关系？这只有存疑，让以后更多的实验来回答了。

五十年后的今天，平心而论，我仍认为在哲学上强调时空的物质性及物质的相互作用，并没有什么大错，我们在物理方面所作的那些尝试，即使思路与演算都有错误，也无可厚非，因而并不觉得羞耻与追悔。相反，我倒很怀念文革时那一段罕有的“桃花源”式的时间。那时，我们看到了国外二、三十年代物理学界思想的活跃，他们对起源不久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争论很多。这也开启了我们的思想，在讨论会上，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互通信息，互教互学，个人并不藏着掖着些什么。例如，W2曾专门为大家讲解了场论中有关的张量计算，令我获益匪浅。记得W1也讲过一课，是关于空气动力学中超音速声障的数

学，即当物体速度接近音速时，它所受到的阻力趋于无穷大。在数学上这与近光速时质量增加的行为非常相似，但声障是可以突破的。……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爱因斯坦晚年自述中的一句话：“自由行动和自我负责的教育，比起那种依赖训练、外界权威和追求名誉的教育来，是多么的优越呀。”

然而好景不常，近在咫尺的清华园内两派武斗越演越烈，毛泽东终于出手了。他派工宣队来收拾那些不听话的“革命小将”，因为“工人阶级必需领导一切”，结果发生了著名的“七·二七”事件。之后不久，我就回校接受工宣队的领导和教育，并参加已推迟一年多的毕业分配。

十月份，我告别了那个多事的清华园，奔赴青海指定的工作岗位，在那里从事接受“再教育”的体力劳动。但我与后来分在张家口的 W1、辽宁的 X 及四川的 Z 保持通信联系，继续讨论物理问题。在我离开之前，小组已注意到单、双程光速的问题，并提出了待定同时性的变换关系。我到青海后，还用它算过“菲索实验”，并给尚在京的 W1 去信，认为我们可以解释它。69年10月回京探亲，又见到还在那个“学习班”里坚持的一些哥们，他们已把带 q 变换整理得十分专业化，作了系统的推导，并铅印了一份内部讨论稿。当时正值文革高潮，科研单位已无人搞业务，故为排印此稿，还专门找回科学院印刷厂的一些老师傅，因为只有他们知道怎么对付有希腊字母和上下角标，及有微积分和矩阵的数学公式，但恐怕那时他们也是心神不定，匆匆忙忙，最后还是有不少排印错处。

再后来事情怎样结束的，我已不记得了。但在青海的十年里，我始终对物理、数学及英文保持兴趣。记得有一次在物理刊物上看到 G 的典型时空理论，我对其度规二次型的正定性有些异议，但投稿后被退回。1976年初我给在天体物理方面已经知名的科大方励之教授写信，谈了我对“典型时空”的一些批评和疑问。两周后即收到方先生的回信，全文如下：

XXX 同志：

3月1日来信收到了。

你提的问题的确是存在的，对于典型时空所采用的度规， $d\tau$ 并不总具有类时性，这从该文(2.2a)容易看到。所以，将 $ds = \sqrt{g_{00}} dx^0$ 规定为原子钟的读数，不能在整个 $\sigma > 0$ 范围中适用。

在宇宙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曲率，是一种容许的设想，把不同的度规连接起来，广义相对论中也是有先例的。当然，具体处理中，是可能有困难。

据我了解《物理学报》准备摘要发表对典型时空质疑的文章，也要刊登作者的答复。但从目前作者准备的答复看，典型时空中的一系列问题似未解决，所以很可能还要进一步地讨论。希望你进一步地钻研这些问题，以提出自己的意见。

这些看法，不一定对，供你参考。如有不妥，请不客气地批评。

祝工作顺利

方励之，76.3.15

信写得开门见山，坦言己见，并无保留，字迹工整，诚挚谦和，毫无客套与废话。我与方先生素未谋面，想必是“文如其人”罢！现在写出来，也算是对先生的一种纪念。

光阴似箭，斗转星移，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门户开放了。由于学业没有荒废，我顺利通过了教育部关于派遣访问学者的考试，于79年8月赴美开始从事快中子实验物理的研究。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没有中关村那几个月的时间以及后来的努力，也许生活对我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无论如何，在那个“学习班”里，至少我学会了桥牌，它给我的生活带来不少乐趣；但不幸的是，我也学会了吸烟，虽然量不多。而赴美之后，就完全戒掉了。■

写于6/2018

附录：

2-2. 待定系中时间-空间的性质

现在把(2.2)及(2.3)表示成四维形式。

令

$$(x^1, x^2, x^3, x^4) = (x, y, z, ct)$$

则(2.2)及(2.3)可以写成(用爱因斯坦求和惯例)

$$\left. \begin{aligned} x'^{\mu} &= a_{\nu}^{\mu} x^{\nu} \\ x^{\mu} &= b_{\nu}^{\mu} x'^{\nu} \end{aligned} \right\} (\mu, \nu = 1, 2, 3, 4) \quad (2.5)$$

其中 $a_{\nu}^{\mu} b_{\sigma}^{\nu} = \delta_{\sigma}^{\mu}$, $\delta_{\mu}^{\mu} = 0 (\mu \neq \nu), 1 (\mu = \nu)$; 而,

$$a_{\nu}^{\mu} = \begin{bmatrix} 1 & 0 & 0 & -\beta \\ \frac{1}{\sqrt{1-\beta^2}} & 0 & 0 & \frac{\beta}{\sqrt{1-\beta^2}} \\ 0 & 1 & 0 & 0 \\ 0 & 0 & 1 & 0 \\ \frac{\sqrt{1-\beta^2}}{1-\beta f} & f & 0 & 0 \\ -\frac{\sqrt{1-\beta^2}}{1-\beta f} & f & 0 & 0 \end{bmatrix} \quad (2.5a)$$

$$b_{\nu}^{\mu} = \begin{bmatrix} \frac{\sqrt{1-\beta^2}}{1-\beta f} & 0 & 0 & \frac{\beta}{\sqrt{1-\beta^2}} \\ 0 & 1 & 0 & 0 \\ 0 & 0 & 1 & 0 \\ \frac{\sqrt{1-\beta^2}}{1-\beta f} & f & 0 & 0 \\ 1 & 0 & 0 & \sqrt{1-\beta^2} \end{bmatrix} \quad (2.5b)$$

可以写出四维间隔(容易证明在变换(2.5)下 ds^2 不变)

$$ds^2 = -g_{\mu\nu} dx^{\mu} dx^{\nu} \quad (2.6)$$

$g_{\mu\nu}$ 称为度规张量。在标准系中,有

$$ds^2 = c^2 dt^2 - (dx^2 + dy^2 + dz^2) \quad (2.6a)$$

因此 $g_{\mu\nu}$ 具有对角形式

$$g_{\mu\nu} = \begin{bmatrix} 1 & 0 & 0 & 0 \\ 0 & 1 & 0 & 0 \\ 0 & 0 & 1 & 0 \\ 0 & 0 & 0 & -1 \end{bmatrix} \quad (2.6b)$$

但在待定系中,由于

$$dx^{\mu} = \frac{\partial x^{\mu}}{\partial x'^{\nu}} dx'^{\nu} = b_{\nu}^{\mu} dx'^{\nu}$$

故,

$$ds^2 = -g'_{\mu\nu} dx'^{\mu} dx'^{\nu} \quad (2.7)$$

其中,

$$g'_{\mu\nu} = g_{\alpha\beta} b_{\mu}^{\alpha} b_{\nu}^{\beta} = \begin{bmatrix} 1-q^2 & 0 & 0 & q \\ 0 & 1 & 0 & 0 \\ 0 & 0 & 1 & 0 \\ q & 0 & 0 & -1 \end{bmatrix} \quad (2.7a)$$

$$q = \frac{\beta - f}{1 - \beta f} \quad (2.7b)$$

ds^2 的展开形式为

$$ds^2 = (cdt' - qdx')^2 - (dx'^2 + dy'^2 + dz'^2) \quad (2.7c)$$

其中出现了一 $2qcdx'dt'$ 这样的交叉项。如果 $q = 0$, 就是相对论的情形; 如果 $q \neq 0$, 则间隔的平方不能写成对角形式, 这表明变换不是正交的, 在待定系中空间是各向异性的。对这种空间应采用非正交线性变换的张量计算, 这里只略作说明。

【怀人】

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沈达力的离去

潘泰泉

2017年的最后几天，北大人的关注落在了互联网里一篇题为《风雨之后，芳华飘零》的文章上。这篇五千多字的长文写于12月24日，文中悼念的沈达菲殁逝于22日凌晨两点，文章的作者又寓居美国，可见互联网传播之快和作者成文之迅速。我是28日中午看到这篇文章的。彼时我一翁一妯正在午饭，刚读了首句“从互联网传来了沈达菲离世的消息”，便对案不能再食。看完之后，我立即上传了如下文字：

惊闻沈达菲去世，痛惜不已！一时无语泪湿。1967年夏天，我在上海串联，曾多次去她家了解达力学姐香殁红湖有关情况，达菲姐弟和沈伯夫妇给我极大帮助。那几天我还骑她家自行车来回跑师大。后来在数力系徐枢等人宿舍见过她。她也来过32楼，不过不肯到达力班。再后来就是学校武斗、战备疏散山东庄、紧急分配，我们再无联系……她和达力一样漂亮热情！我的印象中，她始终是一个小姑娘。愿达菲安息走好！

此后的24小时内，仅我参加的群里，就有数十位北大校友相继写了悼念沈氏姐妹的诗和短文。其中有不认识她俩的，有没见过她俩的，但无一不知道50年前在红湖边被逼无路而自尽身亡的中文系女生沈达力。一时间，对达力的怀念和对邪恶的鞭挞再次被集中唤醒。

一、沈达菲——“反动学生”沈达力事件的最大受害者

沈达菲是沈达力的妹妹，也是“反动学生”沈达力事件的又一个最大受害者。

这位从小在上海华师大二附中长大的姑娘，和姐姐沈达力一样，是老教授沈灌群夫妇的掌上明珠和生命的骄傲。两朵姐妹花长相出众。但在父母眼里，漂亮固然可喜，聪慧和上进更为重要。达力62年考进北大，那年她17岁，早上学又跳班；在中文系，比我这标准年龄入学的64级学弟还小几个月。达菲在师大附小也从四年级直接跳到六年级，中学读的是师大二附中，1966年高三，正好也是17岁。按照正常的逻辑，重点高中的高材应届毕业生肯定进大学，金光大道早就铺好了的。但是和近百万同命运的年轻人一样，那年开始的文革粉碎了她和他们的大学梦。更不幸的是，对沈达菲，这只是一连串噩梦的开始。

沈达菲的父亲沈灌群是大学教授，母亲是大学讲师。父亲出生于江苏如皋县一个三代小知识分子家庭。他从文革开始就是“反动学术权威”；比一般科技界学术权威更“反动”的是，他是教育界的学术权威，而十七年的教育执行的就是“一条资产阶级黑线”；何况他还在重庆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和高教司供过职、解放前就出版过或与人合编出版过《教育社会学通论》等著作。更为严重的是，他1937年考察过日本教育，1944年去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深入研究过美、德等国的教育。在定性为“共产党和国民党长期阶级斗争的继续”的文革中，老先生的身份归类毫不困难。但是，远比隔离学毛选戴高帽子批斗和扫街扫厕所打击更大的是长女沈达力自杀的噩耗传来。沈达菲清楚地记得，父亲一夜之间鬓发全白！从此父亲惜言如金，若非迫不得已，极少开口说话。达力出事那年，也在北大就读的一位儿时伙伴与朋友前往看望沈伯，老人家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只在说到达力在日记里“祝亲爱的爸爸万寿无疆”时，他惊愕地睁大了无神的眼睛“啊”了一声，却仍然没吐一个字！在这以后，老先生在“反动权威”、“美日特嫌”等罪名后，又多了一条“生养了一个反革命女儿”的现行；他必须无休止地交代自己的罪恶，还要彻底和死有余辜的女儿划清界限！支持聂元梓的那派组织的少数人还跑到上海，在华师大揪斗沈教授。

沈达菲必须和这样的家庭和这样的姐姐划清界限。可是她从一开始就做不到。她和姐姐一样，认为父亲一生光明磊落，教书育人桃李芬芳；在国外深造后立即回国报效国家和

人民，永远值得自己尊敬和崇拜。姐姐更是她的学习榜样和为人楷模。姐姐即使有点错误（达菲67年这样认为），也绝不是反党反革命，姐姐是被坏人整死的。她小学六年级的同班同学回忆说，沈达菲小时候就显露了倔强的性格，不愿受一本正经的约束，不人云亦云。

接到处理后事的通知，沈达菲和母亲来到北大接回沈达力的骨灰。人地两疏举目无亲之中，她们看到许多冷酷的心和凝固的血，但也感受到更多的同情和援助。达菲知道姐姐有一个姓姚的同学很有正义感，但她在二院门口找到的姚姓同学却不是那个名字。可是这个姚姓同学不仅告诉她沈达力骨灰盒安放的地方，而且说如果那地方没有，他还可以帮着一起找。不知道达菲当时是否奇怪，这位同学怎么这么清楚，实际上，正是这位从61级因病休学到62级的姚姓同学，亲手把沈达力的骨灰盒从二院室外搬到室内走廊边的一个大窗台上，并且在骨灰盒上盖了几张报纸。哲学系的赵丰田更是把达菲母女安排到了女友、生物系林姓同学的宿舍里，在生活上给予了较周到的安排照顾。

沈达菲第二次来北大是这一年的夏天。北大有越来越多的人认清了聂元梓的校文革压制打击不同意见残酷迫害正义师生的错误，聂元梓、孙篷一的倒行逆施为自己竖起了强大的对立面。为沈达力“翻案”成了全校的呼声。中文系、数力系、哲学系许多同学积极声援支持；为了安慰和平复沈达菲的悲愤，好几位北大同学还带她一起去东北串联。达菲知道，邪最终肯定压不了正！

邪恶消息从北大传到了上海。达菲还没回家，师大二附中就准备好了对她的批斗。激烈残酷的批斗会一次又一次，起先说她是“反动学生”，勒令她和家庭和姐姐划清界限；很快就转入要她交代“去北京串联的细节”。她当然明白，需要这些“细节”的不会是二附中的红卫兵，需要这些“细节”的只能是迫害姐姐的那些人！她被隔离审查了。批斗会上，她的头发被揪着往下拽，这是要叫她低头认罪；可是只要揪她头发的手稍一放松，她立刻就倔强地抬起头来！刚烈的气质令人动容。这一点，沈达菲和姐姐一样。

北大的迫害和反迫害斗争日趋激烈。师大二附中对沈达菲的隔离审查一无所获，红卫兵们无心恋战，沈达菲被从隔离室释放了，当然没有任何结论。1968年，沈达菲被分到崇

明红星农场，在广阔天地里“接受再教育”。虽然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风暴屡屡触及到她，达菲却始终维护着高傲和自尊。同一连队里有许多二附中的同学，大家共同处于社会的最底层，面对和思考的问题开始趋向一致。没有变化的是她的“身份”和不屈服的生活态度。而这种身份和生活态度大体上陪伴着她的一生。

知青大返城，她进了纺织厂。她利用业余时间苦学中医。她的小学同学在回忆沈达菲的文章中写道——

“听说一位著名的老中医收了沈达菲为入室弟子，将自己的行医经验传授给了沈达菲。凭着中医的实践经验，沈达菲成了一名医务人员，在七八级高考时，沈达菲考进了上海中医学院，毕业后，她一直在上海行医。”

父亲沈灌群彻底平反了。老人家青春再焕，奋蹄夕阳，撰写和参编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的教育》、《中国现代教育史》和《中国教育通史》(6卷本)等专业著作，为中国教育史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1989年2月25日，老先生因心力衰竭在上海病逝。本世纪初，母亲石淑仪也安静地离去。历尽劫波，两位老人还总算寿终正寝。“非正常死亡”从而引起这个家庭剧烈震荡的姐姐沈达力也早已被正名，绝不是“反革命”和“反动学生”了。

但是已经和沈达菲血肉融为一体的伤痛不会消失。表面看来，她拿得起放得下，坚强自尊不屈，但是她和别人一样清楚，自己走过的路和姐姐的死密不可分。与其逆来顺受，不若长歌当哭。内心越怕触动那道伤口，那疼痛就越是剧烈。她和北大同学断断续续有着联系，却不止一次婉拒搜集北大文革资料和撰写沈达力个案的好心人的采访与约谈。她总是淡淡地说“不必了”。

达菲得病了。得的是帕金森综合征。近年来病情越来越加重了。

达菲走了。孤独平静安详。

二、沈达力在北大的最后一周

1967年3月12日，农历二月二龙抬头。沈达力离开上海，乘上北去的列车。

四年多以前，她从市三女中毕业考上北大中文系，就是乘坐这趟列车去往首都北京的。那一天她竟然在火车上睡着了，还把头靠在了边上一位同学的肩上。这位同学毕业于上海中学，也是刚考取北大的新生。他就是日后成为研究德国哲学的学者和散文作家周国平。周国平在文中写道：“坐在我旁边的那个女生也有长长的睫毛，睫毛后一对乌黑的瞳仁。她一直在瞌睡，脑袋常常不由自主地靠到了我的身上。虽然这使我又热又累，但我不忍惊醒她，尽量保持不动的姿势。直到旅途结束，我们没有说一句话。后来我在校园里经常遇见她，知道她在中文系，还知道了她的名字，但我们仍然没有说一句话。”沈达力从小就是一个聪慧伶俐的女孩子。早在师大附小的时候，她就以喜爱文学作品和表演文艺节目出了名，是学校文艺演出的台柱子。那个年代从师大附小出来的，谁会记得她参演的说唱节目《老妈妈，瓦尔瓦拉》。进入中学的沈达力是上海市三女中的话剧队队长。夏夜的星空下，个子又高又漂亮的她，身边总会粘着一群附小的弟弟妹妹，听她讲各种好听的故事。那一次是爸爸和妹妹送她上车的。师大二邨还有一个男孩也考取了北大，是物理系。这男孩是上海中学毕业的，父亲和弟弟也要送他上车。巧的是男孩的父亲郭教授和沈达力的爸爸还是读中央大学时的同学。两家是合租了一辆车去的火车站。

这次去北京和那一次是完全不一样了。那次是拿着盖有北京大学红印章的录取通知书走向美好明天的，这次是接到班级文革小组的勒令信回去“交代问题”的，对即将到来的一切心里完全没有底。署名“多思堂主人”的一位沈阳籍64级外系同学在《沈达力之死》一文中叙述道，沈达力在火车上反复观看一本崭新的贴满了毛主席照片的相册，不停地抚摸两块别满了毛主席像章的手绢。心想如果回去被打成反革命，她要天天看毛主席的相片，不过她更希望朝夕相伴了四年多的同学会给她改正错误的机会。她还买了印着毛主席诗

词《长征》《咏梅》的画片，用以激励自己；不过她又害怕，诗词中的战斗精神，会让同学们误会自己“负隅顽抗”，下火车时，她就这几张诗词送给了同车的北师大的一位同学。一直以来，我对这位同学的记述心存疑虑，不是怀疑它的真实性，而是遗憾它没有注明出处。作者与沈达力是认识的，观点相近并一起参加过活动。但是67年3月12日，她毕竟不在那趟列车上；沈达力此后几天，也很难想象他们会有机会见面交谈，“多思堂主人”何以知道沈达力在车上的情况包括心理活动？渠道只有一个，那就是达力出事后，他从那位北师大同学那儿了解到的。而这一点推测，由于时空变化太大，我始终没有得到确证。多年以后，我了解到与她同车回京的，还有同班赵姓同学。他基本证实了多思堂主人的记述；对达力当时所想的，他也基本同意。因为他觉得沈达力当时有点惶恐，感到自己有些做法可能不妥，表示回去后要好好清理自己的问题，“在哪儿跌倒就在哪儿爬起来”，完全没有失去希望。

与此同时，一场针对沈达力的批判会正在紧张策划和积极准备之中。系文革和从属组织的头面人物亲自出马，继召开全班“揭发动员会”后，又布置62级各班积极配合行动。不到两天，32楼从二层到四层的楼道包括楼梯两旁都贴满了揭发批判沈达力的大字报和标语。连女生楼和沈达力宿舍的门上也贴满了。标语有：“闻名全校的母老虎”、“母夜叉沈达力”、“沈达力不投降就叫她灭亡！”、“沈达力不投降是死路一条！”“沈达力必须低头认罪！”等等。

沈达力通过贴满大字报的楼道回到宿舍。住在一起的同学们都搬走了，宿舍里没有人。她的床头贴上了一条毛主席语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一定要顽强地表现自己……”窗下的方桌上，有一张同班女生江蓝生写的字条：“根据现在的揭发材料，我对大家的认识老是跟不上。我认为沈达力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沈达力不知道，这是唯一一条独立思考有正义感的表态。它被抄成小字报，贴在男生宿舍楼。尽管如此，江蓝生后来还是难以顶住压力，自己把那张小字报撕下来了。

3月13日清晨，沈达力把在上海家中就写好的《我的检查》抄成大字报，贴在了宿舍

外面。早饭后，她被叫到32楼看人们给她贴的大字报。“天天读”结束后，“班文革”的一位领导小组成员找沈达力谈了话。当天晚上，沈达力在全班作了第一次检查。她眼含泪水念完了《向毛主席请罪书》。同学们按照准备好的稿子轮番发言批判，纷纷指出她是“避重就轻”，企图“蒙混过关”。结论是“请罪没有诚意再往下滑是危险的！”

实际上，系文革和从属组织的头面人物给沈达力罗列的罪名，除了“与反动家庭划不清界限”和“个人主义名利思想严重”外，主要因为她反对聂元梓将“井冈山”和“红联军”定性为“反动组织”，而反聂就是反对新生的红色政权，由于中央文革是支持聂元梓的，因此反聂就是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党反毛主席。

这种概念外延式的上纲，逻辑上是荒谬的。事实上，当时大部分师生也是不认可的。然而在1967年春天的北大中文系四年级，这样的悲剧却一幕接一幕推向高潮。

3月14日，北京高校组织“打倒谭震林”的游行。沈达力在宿舍里一边哭一边给母亲写信。中午，一个外校的老同学来找她，她痛苦地对那个同学说：“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情绪与前两天在火车上相比，明显发生了很大变化。下午，游行回来的赵姓同学和邹姓同学以及北师大的孙姓同学与沈达力在校园里谈话。他们心情沉重地走到了西校门外的蔚秀园。虽然同学们都很同情沈达力，但在那种恐怖的气氛下，谁也不敢多说什么，只是让她认真检查自己的个人主义，总结教训。这一天，她还去物理系找过前面提到的郭姓同学。然而这位同样从师大二部走出来的儿时伙伴当时却正在广州串联。如果那天他们见面了，也许结果会有不同。

3月15日，她上午在宿舍里继续检查自己几个月来的表现，因为下午她要在班里的批判会上进一步检查“罪行”。下午班级召开了“沈达力问题串联会”。由于会前贴了海报，串联会来了一些其他年级和其他班级的同学。会上集中讨论了三个问题：1、沈达力曾经公开表示同意“红联军”头目赵丰田的“北大左派先天不足论”是什么立场？2、沈达力对中央文革认定“井冈山”和“红联军”是“反动组织”想不通是什么问题？3、沈达力认为给林副主席贴大字报的人“也不一定是反革命”，是什么性质？大家议论纷纷，决定要求

沈达力交出有关“黑材料”。晚上，沈达力宿舍的门外又贴出了一张《通令》，说她犯下了“滔天罪行”，要“立即交出全部黑材料。”深夜，她一个人在未名湖边转圈，半夜11点多才回到宿舍。

3月16日，上午全班同学都去听农业科学院一个人到北大做报告。下午，一些同学聚集到她的宿舍，要她交出“黑材料”。此时的沈达力已经不能确定自己有没有“黑材料”和哪些是“黑材料”了，她打开自己的衣箱书箱，蹲在地上，把本本、信件等一样样翻给她们看，边翻边问：“这个你们要吗？”“那个你们要吗？”她的双手哆嗦着，脸憋得通红，汗水不停地沁出来。得知情况后赶来的系挺聂组织负责人当场命令立刻查抄！于是，沈达力的所有私人物品被翻得一片狼藉。一切材料都交出去了包括前天即14日的日记。

晚上，系挺聂组织领导找沈达力“谈了话”。谈话内容无人得知。但是在14日的日记中，沈达力已经有了轻生之意，“领导”不会没看到。在这种情况下，“领导”谈了什么，又采取了什么措施呢？

3月17日，星期五。上午，全体学习《解放军报》社论和《文汇报》社论，沈达力也参加了学习，还认真地记了笔记。下午，全系师生在第二教学楼召开大会，再次批斗“反革命分子陈一谔”。陈一谔曾是年级学生党支部书记，因给中央写过一份万字的建议书被打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后来写了《我在北大文革中的遭遇》，说这是“北大最残酷的批斗会”。今天看来，至少是中文系最残酷的一次，几乎从一开始就是武斗会和群殴会！阵阵惨叫声中，陈一谔右臂被拧断，左肋被踢折，头发被一缕一缕揪下，汗水和血水浸湿了地面，直至瘫倒在地昏死过去，根本听不见对他的所谓批判。

沈达力就坐在会场的前几排，目睹了这场暴行的全过程！

更为不堪的是，对陈一谔的批判突然变了方向。他们把陈一谔日记中对沈达力的称赞和爱慕词句念出来当众褻渎与羞辱！说他们是“反革命阶级本质相同的臭味相投”，是“两个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最后，黄某某宣布：“明天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沈达力！”多年以后，中文系65级的才女，夫妻以“达理”笔名发表作品的陈姓同学回忆说，批斗陈一

谿的时候，沈达力就坐在她的前排，“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她哭泣抽搐的背影”。

批斗会后，全场的人都走光了，只有沈达力一个人木然地坐在会场。旁边的同学拉起她来。她流着泪走出二教。

可想而知，这场对陈一谿的批斗给予她的震撼和惊怖是何等巨大。

当天夜里，很晚了，她还没有回宿舍。几天前与她同车回京的同班赵姓同学与本班同学一起参加了搜寻，并报告了校卫队。他们在红湖假山旁找到了已经死去的沈达力。很惨，周围冻土和大片草皮被抓刨蹬踢，衣服也不整齐，死前肯定异常痛苦！

3月18日一早，一个尖锐的女高音在32楼男生宿舍响起：“哎——！216宿舍的伙计们！你们知道吗？那个家伙死喽！”接着传来她的开心大笑。发出这样欢叫和欢笑的是同班同学，与达力同姓。

上午，全系召开大会。“她的问题，死前是人民内部矛盾，死后就是敌我矛盾了！”中文系文革主任说：“立即召开声讨、揭发、批判大会，把她搞臭，肃清一切影响！开除团籍；把两条路线斗争进行到底！”挺聂组织的领导说。他们在32楼前连续组织声讨会，批判沈达力“自绝于党和人民”、“畏罪自杀”、“罪该万死”、“死有余辜”。

沈达力是自杀身亡的，她喝了来苏水。误服来苏水3克可致死，口服8克会很快死亡。证明沈达力是自杀，还有她的三封遗书，有写给父母的，有写给弟妹的。但是，读了沈达力在北大的最后一周、也是她生命的最后七天的经过，人们会不会问一问，她为什么会在花季之年，选择决绝和轻生呢？

真心暗恋着沈达力的陈一谿说她是个美丽、清纯、活泼的姑娘。他说沈达力自幼就受到良好教育，又非常聪颖好学，积极追求上进。始终成绩优良，开朗又自尊。进入北大以后，先后参加文学社、合唱团和短跑队，是个才华出众全面发展的典型。她的离去如狂暴的风雨摧折花树，令人们错愕惋惜怅惘。

从我们班走出去的学者赵园写道：“令我倾倒的还有高班学生。记得曾有一位沈姓女生领我们做操。那自信与干练，令我们羡慕不已。吸引了我们的，是所谓风度。这沈姓女

生已不在人世，在文革初期自杀的。只是恍然记得那身姿，怅然了好一阵子。”

曾经被睡着了的沈达力靠在肩头的周国平进北大之后，在校园里多次遇见她并知道了它的名字，但两人从没讲过话。知道她自杀的消息后，周国平十分难过，亲自到红湖边上在内心凭吊了沈达力。

中文系五个年级的同学们都不止一次看过沈达力的演出，大方又阳光的气质给人的印象极深。外系的许多同学，也还记得她在大饭厅演出的表演唱《老两口学毛选》。东语系的杨姓同学清楚地记得在固城下连当兵活动。“在那里，我见到中文系的沈达力。她长得亭亭玉立，气质高雅。身穿一件淡蓝色的衣服，她负责与解放军联系文艺晚会事宜，办事干练。文革的一天，我在大饭厅旁的柿子林下看大字报，忽然看到沈达力在红湖畔服毒自尽的消息，心中怅然。”……

沈达力离去的时候，我正在赣东北的一个铜都串联。回校以后，目睹聂孙校文革的一系列倒行逆施和不思悔改，毅然站到了他们的对立面。稍后，周培源季羨林侯仁之等著名教授也上了山。那年夏天，我带着对沈达力被逼自尽的不平和同情，在上海造访了她的亲人。

如今达力、达菲都已离去，我希望能够找到她俩的弟弟。我上一次见他，是1967年，半个世纪前了。

三、和沈达力弟弟半个世纪后的再会见

仰仗许多校友和朋友的帮助，元月2日中午一点四十分，我终于和弟弟通上了电话。一开始我就说明了来意。我说达菲离去，许多北大校友都很难过；我打算写一篇文章，希望通过他再增添一点材料。电话那头没声音。我的心不禁一沉，生怕弟弟也和达菲一样，回我一句“不必了”。于是我赶忙说，真不该在这时候打扰，实在因为交稿付印很急——没想他打断了我的话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在想什么时间合适。我连忙说，我都可以，

只看你方便。他先说第二天晚上八九点，后来怕天太晚我年纪大不方便，说第二天下午等他通知。来回几次电话以后，最后确定就是当天晚饭后在人民广场附近见面，时间场所由我定。不想我将安排用短信发给他不久，他又来了电话，问我能不能现在就出发相见，地点稍后短信发来。我当即表示完全可以。此时是下午三点二十五分。我之所以如此琐碎地交代这一过程，实在是这次见面太及时又太不容易——他元月四号就要离开上海。在这以前还有许多事情比如丧事善后、同学告别，还要留点时间陪陪外甥女等等。和我见面他是尽了最大努力了。

地铁一小时后，我按了一栋公寓楼的门铃。这里是沈达菲的家。等着我的还有达菲的女儿 Camuse。达力弟弟我已经不认识了。确切地说，我对半个世纪前的他，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那时他还是个初中生，个子高高的，瘦瘦的，基本上也没怎么参加谈话。至于 Camuse，我则是初次见面。“我是潘泰泉，”还没坐下，我就递上了身份证，同时取出一本书说，“这是我以前出的一本旧书，上面有我的介绍和照片。”他说着：“还需要这样吗？”却还是在 Camuse 之后看了我的身份证和书。我说：“江湖太险恶，人生多歧路。还是留个心眼好。”其实，这是我在家就想好的见面方式，便于很快取得互相信任。敏感时刻，敏感话题，又几十年全无来往，立刻融洽是不可能的。记得 50 年前，我第一天在他们家的采访很不顺利，第二天就完全不同了。沈达菲告诉我，那天我走了后，和他家已经很熟的技术物理系的一个同学也去了，证明说我所在的中文系某战斗队是坚定反聂的，不可能是挺聂组织的探子。达菲和沈妈妈还说委屈我了。当我回忆起那年在他家谈得很晚，沈妈妈让我吃点热汤点心，然后催促我早点回家，免得“做妈妈的担心”时，我们三个人一时都沉默了。

Camuse 从微波炉里取出鲜肉小月饼。我和她一人吃了一个，弟弟中午饭没有吃好，他吃了两个。Camuse 说，这种半成品现在很方便，她经常买。此后他俩一边和我说话，一边折着锡箔元宝。我问是不是准备做“二七”焚化用的，Camuse 说，他们没有特别讲究，尽点心意就行了。几天前，达菲的同学们和朋友们问她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她回答说，“没

什么事情，我不打算弄什么。”“家风一直丧事从简，我和舅舅也商量过了，谢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妈妈的关心与照顾！”达力弟弟也请转告大家，非常感谢家姐的同学们对她的追思缅怀。姐姐在天之灵，定会感到欣慰。

我们的交谈不大像采访，更像是互说别后经过。对于姐姐的早逝，爸爸妈妈始终想不通，也始终放不下。爸爸用拼命工作来填满时间，避免闲下来会想起往事，最后的那些日子都有点悒郁和恍惚。事实上，达力弟弟说得并不多，语速也较慢。对我的有些提问，他用沉默作答；我也没有再问。他也问过达力的有些同学现在何处，我也不答，他也没有再问。看得出来，他不想重揭伤疤，但伤疤还在，而且经常隐隐作痛。

四、50年后的再思考

沈达力离去了。她在黑暗中（或者是光明里？）走了50年了。我读了不少北大校友和达力达菲的校友朋友怀念他们的诗文。我当然发现这些诗文里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沈达力事件50年后的再思考。

思考一：文革一定不能再搞了！这个问题似乎不用思考。其实不然。近年来“为文革翻案”的调门似乎越来越高，甚至对《关于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要说三道四。其实，对任何历史问题的反复追溯，都是对现实的认知。简单地说，鼓吹文革好，便是说拨乱反正错，改革开放糟，今天的继续深入改革开放就是更错更糟，显然这是大多数人不能接受的！现在的遗憾是，缺乏理直气壮的正面引导和坚持，过于听任错误思潮泛滥。需知全面否定文革，坚持改革开放也是不忘初心！沈达力的悲剧，在文革中的北大不是个案，比这更惨烈的暴行还有；在文革中的北京和全国更是九牛一毛！如果说文革有什么成果，这类悲剧就是成果之一。

思考二：没有人性的派性就是兽性！文革中有“派性”。对派性也要有分析。某一群人持一种自认正确的观点或坚守或宣示或辩论都是正常的，应该被接受并鼓励的。对不同

年龄性别经历的人要求“万众一心”是不现实的，因为“闻道有先后”而且“人各有志”。但是所有派性都必须要有的人性。那种随意对徒手个人侵犯肢体摧残皮肉毁灭生命的“派性”就是兽性！我始终认为，除非面对正在实施的危及生命的暴行和战场上的对手，上述行为就是野兽行为。不知道这种看法是否属于“普世价值”，但人性总该有吧？据说挑起北大武斗蹲了大狱的孙篷一得知陈一谔和沈达力的遭遇，也发现了鳄鱼的良心，说“中文系搞得太过火了”。

思考三：罪莫大焉是极左！由于揭示不够批判不力打击不狠，在文革中达到顶峰的极左思潮和极左行为至今仍然猖獗。“左比右好”的认知误区直接导致“宁左勿右”的行为荒谬。对热衷极左的人来说，“一带一路”的成绩和“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他们闭眼不见充耳不闻，打着“爱国”和“民族主义”的幌子，抵制洋货抵制洋节砸洋车砸“家乐福”砸超市里的圣诞树，实际在于着卖国和自绝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勾当，实在是罪莫大焉！这些人无知无识又精神错乱，说不定问他们马克思要不要反，他们会反问你“这姓马的是哪国人”呢！在沈达力事件中冲在前面又无比卖力的那些头面人物至少在当时属于极左派，不是无知狂妄如“联动”，就是极端个人主义私心膨胀。

思考四：关于灵魂救赎的话题。不知道有没有真的灵魂救赎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是“丢掉包袱轻装前进”总不是迷信。对于在沈达力死后奔走相告额手称庆的个别同学的做法，周国平说，那是一种“毁灭了美之后的兽性疯狂”，他认为沈达力是被丑陋的嫉妒杀死的。郭景德文章说，沈达力之死，是对那段人性泯灭的历史和泯灭人性的人们悲惨的控诉。他们的看法不同，但有共同点。我觉得，那时候的她们不同于野兽的疯狂，错误是可以改正的。问题是有所认识，有所行动，以求得宥谅和宽恕，更重要的是，求得自我心灵的平静，不再自责，不再做噩梦，不再永远跳不出那个怪圈。■

2018. 1. 12 完稿于上海

作者简介：潘泰泉，1964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中央电视台无锡影视基地编导。

【资料】

我们是怎样教《学习雷锋》这节课的

北京师大女附中初三组

当我们开始备学习（罗瑞卿）这篇课文时，感到这内容虽然不深奥，条理也特别清晰，但却很不好讲。因为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后，两年多来，学生天天都在学雷锋，特别最近又看了电影《雷锋》，对雷锋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课文中讲到的一切，都是学生所熟悉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能使学生在认识上有所提高，使班里学习雷锋行动向前推进一步，那这节课的教学效果将微乎其微。

怎么办？我们首先还要提高学生对学习雷锋的认识，就先要了解学生现在学习雷锋做得怎样，然后才能有的放矢地去提高。因此，我们第一步就作一次调查性的作文——“两年来我学习雷锋的收获”。

从这次作文中，我们发现学生学习雷锋还基本上停留在表面上学，如学习雷锋做好事，帮不认路的老人找家，在汽车上给老人抱孩子的妇女座，给班里买粉笔……学习雷锋的艰苦朴素也还多半限于在生活上的简单学习，如不吃冰棍、不穿新衣服，自己补袜子。我们认为，学习雷锋做好事，生活上艰苦朴素是很好的，应该的，但这还远远不够，还有把雷锋的精神——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真正掌握。

学生的思想情况了解了，问题也发现了，如何解决呢？用什么方法才能使学生更好地把学习雷锋的认识提高一步呢？这时候我们又想到一切认识从实践来，理性认识从感性认识发展而来。同时，我们又听初一组同志讲《谁是最可爱的人》一课，她们先讲课中三个故事，然后讲开头，结尾议论抒情部分。这种作法使学生先由感性认识开始，然后再提高到理性认识，印象深刻，她们的作法也启发了我们，再加上在征求学生意见时，学生也提出了多讲讲雷锋事迹的要求，我们就决定在分析课文之前，先开雷锋故事会。我们把课文中提到学习雷锋的四个方面——为人民服务，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艰苦朴素，又红又

专分派给四个小组的学生，由她们自己动手找有关材料，编成故事在故事会上讲。

这次故事会的准备发动了群众，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出动了。在同学的努力下，故事会开的很成功，效果很好。通过这次故事会，使学生广泛地阅读了有关雷锋的材料，重温了雷锋的动人事迹，锻炼了她们编写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有的小组全组上台，有的班全班上台，学生普遍地受到这方面的锻炼）有的班做到形式多样，在一个内容的故事中，就运用了诗歌、快板、说书、三句半、雕塑等形式，不仅使故事会开得更生动活泼，给人印象深，而且还能更有效地提高同学们的创作能力。

故事会开后，有的还开了评议会。

这样大家对学习雷锋在感性上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体会，而且是通过她们自己动手掌握的东西，印象也较深。这时大家对学习雷锋在感情上有更高的要求，都希望教师能从思想认识上帮助她们提高一步。这样，不仅给我们分析课文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而且使学生提高认识也有了基础。

通过调查，已经知道学生学习雷锋上存在的问题，是还没有很好掌握雷锋的精神。这样，我们在分析课文时，就确定首先重点分析雷锋如何学习毛主席著作那一段（第五段），以突出雷锋的主要精神——反反复复地读毛主席的书，老老实实地听毛主席的话，时时刻刻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一心一意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以使学生真正地掌握。

在讲雷锋具体表现的那四个段落时，我们着重联系学生的思想实际——学习雷锋的片面性和表面生来讲，以解决她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把雷锋的精神真正学到手。

课文的开头和结尾——雷锋的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条件，环境以后如何学习雷锋，学习雷锋深远意义这两部分，我放在最后讲，让学生从理论上认识到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只要照着雷锋榜样去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都可以为人民、为革命建立不朽的功勋。

课文全部分析完后，我们再找一部分同学全文朗诵了贺敬之的诗《雷锋之歌》，这一方面可以使同学在故事会和讲课的基础上，从文学作品的形象感染中，再进一步地体会

雷锋的动人事迹和伟大精神，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学生丰富课外知识，提高欣赏和朗诵的能力。

通过以上一系列教学过程，同学们对雷锋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能力提高。这提高需要巩固和发展。于是我们又让学生写了一次作文——“把雷锋精神真正学到手”。要求学生写出学习这节课对学习雷锋的新的认识，还要写出自己以后打算怎样学习雷锋。的确，把前后两次的作文相比较，就看出学生学了这节课之后对雷锋的认识是有了提高。大家都明确了学习雷锋，首先一条也是最要的一条是学习他的认真读毛主席的书，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努力培养自己成为又红专的革命接班人。

全课教学结束后，我们还通过口头或书面的方式让学生给这个课开评议会。大家一致认为，这节课的教学较合乎教育方针提出的让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学习的精神，学到的东西较多。她们也提出了不足之处，如有的同学提出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一段应在故事会以前讲，然后再开故事会，使故事会与课文中的四段连续起来，两者可以结合得更紧密些。关于故事会准备时间比较仓促，各班各组也不平衡。再有，关于《雷锋之歌》的朗诵有的同学建议再扩大范围，让更多的甚至全班同学得到练习朗诵的机会。

这节课我们一共用了10—19节课（两次作文算在内），课时虽然花得较多，但学生的收益是多方面（当然不能每课都这样做）通过这节课的教学，我们有下列几点体会：

1. 调查研究，了解学生是克服教学上的主观主义，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一环。
2. 结合教材特点和学生的实情况，集思广益研究出有效的学方法，可以打破框框，避免千篇一律，创造活泼生动的学习局面，
3.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通过学生自己动脑、动手、动口掌握知识，可使知识掌握得牢靠。
4. 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材的特点，多方面训练学生的能力，特别是基本技能（读、写、讲），可以较有效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
5. 在学过程中（特别在低年级）能让学生先从感性认识入手，然后提高到理性认识。学

生对学习的东西容易理解和接受，印像也较深，也容易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引导学生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可使学生巩固认识并逐步提高认识。

以上是我們教“学习雷锋”的一些体会，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此文摘自《岁月女附中丛书》之《史料文存》（中）页836--839）

【资料】

北京师大女附中学校工作三年规划（草案）

1964年—1966年

前言

为了全面、正确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调动起一切积极因素办好革命化的学校，并使工作更处于主动，精益求精，摸索各方面工作的经验，我们认为有必要制定一个三年工作的规划。规划内容分为以下几部分：

- 一、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 二、提高教学质量
- 三、改进体育卫生教育
- 四、培养红专队伍
- 五、学校规模、设备及修建中点

这个规划(草案)主要是指出工作努力的方向,具体做法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改进和充实。

一、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一）努力方向：

树立“革命热情高，团结友爱好，谦虚好学，俭朴勤劳”的校风，按照党的教育方针

要求，高初中毕业生在升学和参加劳动，特别是农业劳动的问题上，能服从国家的需要。

（二）教育重点：

阶级教育、革命传统和革命前途教育、劳动教育，特别是为农业服务教育。

（三）教育原则、方法，针对中学生特点，活学活用解放军政治思想工作经验。

1. 系统地做调查研究，点面结合，深入了解学生思想实际，针对不同情况，抓活的思想教育。

2. 表扬好人好事，树立先进榜样，通过实例进行正面说服教育。

3. 重视群众性的自我教育，正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4. 集体教育与个别教育紧密结合，集中性的教育运动和经常性的思想工作互相配合。

针对青少年特点，注意方式方法的多样性、生动性。

（四）主要措施：

1. 每年组织一次教育方针的学习。

2. 按照教育方针，围绕教育重点，针对初高中和毕业班特点，以阶级教育为纲，系统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积累资料并总结经验。

初一：怎样做一个中学生（着重进行中学生守则教育，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生活习惯，指导学习方法，加强纪律教育，建立班集体。）

初二：怎样做一个革命青年（继续巩固班集体，引导学生有远大志向，进行“争取加入共青团”的教育。）

初三：怎样做一个合格的初中毕业生（着重进行劳动教育和为农业服务的思想教育正确对待毕业和升学问题，教育并帮助学生合理安排学习生活。）

高一：树立革命的人生观（着重进行班集体和学习目的的教育，引导学生学习毛主席的思想方法，分析问题，对待问题。）

高二：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着重培养学生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革命观点，通过课内外活动，提高实际工作的能力。）

高三:怎样做一个合格的高中毕业生(着重进行个人前途与国家关系的教育,正确对待升学和就业的问题,特别是参加农业劳动的问题。教育学生按照“三好”要求,合理安排学习生活。)

3. 加强劳动教育

(1) 坚持初三以上一年一个月下乡参加农业劳动的制度。劳动前必须组织学习,劳动后有总结并给学生做出劳动鉴定。(写入成绩册)

(2) 初一、初二参加校内校外公益劳动,总时数必须达到一年一个月的规定。

(3) 建立经常的批评表扬制度,设“劳动光荣榜”。表扬劳动中的好人好事。

(4) 重视宿舍生活劳动和家务劳动。

(5) 农基课要密切联系实际,多实践,多组织参观。

(6) 与公社、农林场建立联系。

4. 合理安排节日、假日的教育内容,并使之传统化。

(1) “五一”、“十一”着重加强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教育。(参加游行练队、晚会活动);“一二·九”着重进行革命传统和革命前途教育。(报告会);“五四”表扬“三好”学生,优秀团、队员评比优秀班集体,优秀团支部、少先队中队,进行“学先进、赶先进”的思想教育;新年除夕举行全校性的一年来革命文艺创作会演。

(2) 利用寒假举行军体活动。

(3) 寒暑假适当组织毕业生参观。

(4) 校庆逢五逢十举行纪念。

5. 学习主席著作

初三以上开展群众性主席著作学习活动,以自学为主,联系实际,活学活用。政任、团组织做适当辅导。

6. 通过各种政治活动及社会实践进行教育,加强调查研究,摸索思想教育规律:

(1) 各年级确定一个重点班,通过重点班情况分析,掌握全校学生思想动态,以便及

时进行集中教育。

(2) 各班建立个别学生(突出好的和差的)的档案,逐年交接,积累资料,摸索个别学生教育方法。

(3) 对学生家庭出身进行一次复查:以后重点调查初、高一新生的情况,针对不同家庭出身的学生特点,进行分析研究,重点总结革命干部和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的思想教育经验。

7. 做好家长工作:

(1) 教导处建立与家长联系制度(重大活动与教育措施应通知家长,学生的考勤、奖惩与特殊情况应向家长汇报。)

(2) 班主任应有计划地与家长联系。

(3) 定期召开全校或年级性家长会,向家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4) 充分依靠家长的支援,向学生进行思想工作。(请家长做报告,访问革命干部、老工人等。)

二 提高教学质量

(一) 努力方向:以党的教育方针为指导思想,根据“中学工作条例草案”的精神,以各科教学大纲及教科书为依据,在党支部和行政组织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各种组织的作用和教师的主导作用通过师生的共同努力,全面地完成教学任务。

(二) 要求:三年内争取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成绩并总结经验。

1. 教师一定要有全面负责的观点,做到既教书又教人,既管教又管导。首先做到以下几点:

(1) 建立革命的师生关系;在教学相长的原则下通过教师的主导作用,培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自觉性。

(2) 教师必须适当地参加一些学生的集体活动,以便全面地了解学生。

(3) 任课教师固定一个班,协助班主任工作,并深入了解几个不同类型的学生,做观察记录,为指导学生的学习积累经验。

2. 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风气。

(1) 教学必须从学生的实际出发,讲求实效,坚决克服教学上的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

(2) 各科教学应研究如何联系当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

(3) 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引导学生把知识用于实践(包括社会实践)。

(4) 理化生三科应全面提高学生的实验能力,初步培养学生科学的工作态度和方法

3. 努力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指导学生学习方法:全校师生员工同心协力,合理地稳定地解决学生负担问题。

(1) 对学生的政治活动、文体活动、社会工作等方面,必须做全面安排。

(2) 课堂教学应使大部分学生能在课内理解课程的基本内容和解决基本问题。

(3) 研究合理地布置课内外作业。

(4) 学生的社会工作坚持一人一职的原则,并贯彻团中央的指示,从培养教育观点出发,实行轮换。班主任和团队组织要帮助团队班干部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

4. 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

(1) 课堂教学面向多数,照顾两头。

(2) 各教研组应重点搞好一个学科研究小组,以点带面,激发学生钻研兴趣。

(3) 支持学生参加校外的科技、文体活动。

(4) 充分利用壁报、广播、讲座、报告会等形式开展学术性活动。

5. 继续学制改革试验

(1) 加强对实验班的全面领导。

(2) 几门工具课应积累资料,定期总结。

(3) 1966年全面总结1961年入学的两个实验班的经验。

6. 继续研究和逐步改进成绩考查办法。(包括理化生三科的实验考查和成绩评定办法)

三、改进体育卫生工作部分

(一) 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 保证每天上下午各有二十分钟的活动时间, 以便养成锻炼习惯, 从积极方面来增强学生的健康。

(二) 控制近视眼的学生不再增多。切实按照市局指示, 加强教育, 改进设备。

(三) 各班设保健员一名, 做好疾病防治情况汇报工作。

(四) 建立定期体检制度做好卫生保健宣传工作。

(五) 绿化校园及宿舍空地, 减少尘土。

四、培养红专队伍

培养一支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 是办好社会主义学校的基本保证。教师的提高必须是又红又专的方向。只有成为革命的教师才能担负起培养革命后代的任务。

一、要求: 根据每个教师的具体情况, 订出个人三年提高的规划, 定期检查执行情况并交流经验。

二、提高的主要途径:

(一) 提高政治觉悟方面

1. 政治理论学习:

(1) 领导干部、教研组长成立一个主席著作学习小组, 以提高领导工作水平。在教研组的范围内, 自愿结合, 组成小组, 开展群众性的主席著作学习。

(2) 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学习: 哲学、政治经济学、党史, 三年内一年开讲一门, 自愿参加。由本校政治组负责系统讲授、辅导。

(3) 反修学习按照上级布置进行。

2. 教育方针学习。

每学年转合总结工作进行 1-2 次。

1. 时事政策学习:每天看报,认真学习党的各项政策,联系思想实际工作。

2. 按照中学工作条例草案规定,实行参加体力劳动制度,有条件的教师轮流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寒暑假适当组织工农业参观访问。

3. 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担任社会工作。

4. 开展群众性自我教育,坚持一月一次工会组织生活,开展批评、自我批评,表扬好人好事。

5. 教研组是提高政治、钻研业务的基地。教研组长既要管业务又要管政治思想工作,工会组长既管生活又管政治思想工作。

(二) 提高业务水平方面:

1. 学习马列主义的教育思想,运用党的思想工作的基本方法,(群众路线《抓两头带中间,培养典型以点带面,少而精抓主要矛盾...》)提高工作水平。

2. 通过教学实践,边教边学学以致用,缺啥补啥,练好基本功。

3. 结合教学系统进修本科教材。

4. 了解有关科目的教材内容。

5. 班主任业务学习,主要学习教师进修学院的基本篇目。每月一次(自学或讨论)。

6. 结合教育教学工作进行专题研究并总结经验。

(三) 对职工的要求:

职员:树立为教学服务的观点,使后勤工作革命化。

1. 提高政治觉悟方面:(同教师)

2. 提高业务方面:

(1) 熟练掌握本职业务,熟悉本部门工作。

(2) 学习有关方针政策。

(3) 围绕本职工作,提高文化,练好基本功。(会写工作总结、计划,请示报告,记账等。)

工友:

1. 坚持读报,由专人负责,边读边讲。
2. 围绕工作学文化。(会记账、打算盘等)
3. 定期讲解党的方针政策。

五、学校规模、设备及修建

- (一) 初高中稳定在 36 个班。住宿生逐年增加到八百人。
- (二) 争取修建实验楼、外语室???(注:此处字迹不清)或拆改实验室。
- (三) 安装北楼、礼堂暖气。
- (四) 修建宿舍楼。
- (五) 改建操场。
- (六) 根据教学大纲,每年抽出五千元到一万元用作物、化、生、体育仪器教具的填补。■

【资料】

卞仲耘 1955 年笔记摘录

一、什么是正面积积极的教育原则

以革命的世界观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来教育学生,让他们看到未来的远景,以及个人的准备培养学生的自尊心、自觉性和积极性,以及自信心,时刻懂得要做什么?如何做?它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物,理论根据是马列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物质基础是消灭人,剥

削人的社会才可以实现。

这是教育过程中，用青年本身的优点克服缺点，而逐渐成长起来。马卡连柯说，人生若是童年无乐趣，就不可能活在世上，用明日观察鼓励青年前进，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而努力。

二、如何掌握原则

（一）教师要建立革命的人生观，唯物主义世界观，集体主义者，对社会，对祖国要忠诚，思想上要武装起来，要在教育同学中来教育自己。

（二）要了解青少年的特点。学生处在长身体、长知识的阶段，但不成熟，缺乏经验，热情单纯一接受新事物，容易冒失。青少年受教育的范围很大，如参观工厂，展览……

（三）要认识教育工作的特点。培养人的工作是集体的创作，它本身是有主导作用，包括他本身的创作，细心耐心，还有预见性，如园丁培植果木树一样，而教育更困难，孩子本身有主观能动性，在引导中要注意，避免拔苗助长，要了解原因，防止急躁情绪，善于启发自觉。

（四）要做青年人的朋友和榜样。教好课是主要的一面，仅仅如此是不够的，有的是想上课在晚上，密切联系学生，主要是要正面指导和尊重，信任，而且关怀他们，了解他们。看问题，不要主观武断，要启发他们，引导他们，抑制自己的意见。对工作和教课有意见时，要倾听，一视同仁，不要偏爱，要像医生一样，来医治有缺陷的同学。

三、方法运用

（一）课堂教学中，重视启发学生的积极性，培养独立见解和独立工作能力，认识世界的美好未来要靠大家来创造，有头脑，有思想，发挥他们的主动创造精神，正面积极的教育原则的掌握，变为自己的教育思想。单纯从方法来考虑，是没有用处的。

（二）通过各科课外活动，参观访问，实习社会工作，旅行，在活动中，对同学进行

教育，能起到语言不能起到决定作用，和辅导作业，实践，变为教育，能够克服严重的缺点，用法，远大的理想与，具体的活动联系起。

(三) 阅读指导。好书是教师有力的助手，对孩子的培养引起很大的作用。

(四) 经常监督和严格要求，合理的严格要求就是对孩子最大的信任——马卡连柯。

(五) 表扬与批评，表扬要结合事实《适当的批评也很必要》。

(六) 奖励和惩罚。■

【读者来信】

1. 任国庆：近期《记忆》小鹰的文章甚佳

小鹰的文章提示我们，研究文革应该“精准化”。我所谓“精准化”，是指史实上的准确和概念上的严谨。比如，“走资派”这个概念，毛泽东文革的“走资派”是什么？是不是指今天的贪官？进一步想，“文化大革命”的“文化”在毛泽东哪里究竟指的是什么？类似的相关文革的，最基本的概念还有很多。比如“资产阶级”在毛泽东那里是什么意思？“资产阶级法权”在毛泽东那里是什么意思？它应该是什么意思？等等。小鹰的文章做了很好的榜样。■

2. 张建伟：扩大研究领域，重视保守派、逍遥派研究

国内的文革研究，少说也有三十年了吧？应该说是成果累累。但是，细看这成果，都集中在高层政治，群众运动上面。高层政治离不开北京，中南海，毛家湾，群众运动离不开红卫兵、造反派。连保守派、逍遥派都不放在眼里。要知道，保守派是毛的社会基础，逍遥派是大多数。团派最多时上万人，越到后来人越少，真正打起来的时候，就剩下几百人。老四也一样。你问问大学老五届，分配前什么时候人最齐最多。肯定是学校发粮票的那一天。热心打派仗的毕竟是极少数。要深入研究文革，就得扩大范围，把保守派和逍遥派纳入其中——他们是怎么样想的？他们整天干什么？■

【本刊声明】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2008年9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本刊的宗旨，并取得会员资格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xx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编校：方惜辰

本期封面：邹行